

温州 史志

W E N Z H O U S H I Z H I

2022年第1期
(总第138期)

主办：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温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 1月11日，全国地方志系统表彰先进会议召开。温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受中指组通报表彰，被评为全国地方志系统32个先进集体之一

(周铁炯/摄)



■ 1月25日，省党史学习教育第三巡回指导组组长、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金延锋到我室调研

(周铁炯/摄)



■ 3月15日—24日，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志办）下沉包联社区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金默 姜晓雯/摄)



温州史志

WENZHOU SHIZHI

存史

资政

育人

2022年第1期
(总第138期)

■ 学习思考

- 03 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积极在全市发展大局中展现史志作为 王文胜

■ 专 题

- 11 千年商港的近代化历程 温州文史馆

■ 资政专栏

- 17 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几点思考
——以平阳县为例 王 祥
24 挖掘党史资源 打造鹿城党建新风尚 王剑峰

■ 史志释读

- 29 《周官》即有学校与军制相辅
——读孙诒让《东游日记》叙 张声和
33 泰顺古代乡绅对地方建设的贡献
——以《分疆录》为中心 谭桂涛

■ 志鉴交流

- 38 编撰史料 贵在坚持
——谈编撰《泰顺县交通志》体会 林 泉
40 主编村志的六点体会 徐世槐

■ 历史人文

- 44 抗战时期温州情报战线上的爱国壮士徐福兴 郑颀峰
51 老骥伏枥 誉满杏坛
——记温州教育界老前辈李方华 李岳松

目录 contents

■ 岁月回眸

- 56 四十年后再回望
——《金乡奇闻》发表的前因后果
吴东峰
- 61 国难求学路 温州赶陪都
——兼述国立中央大学沿革与
战时的概况及其他
许岳林
- 73 僧侣“复生”记
明 人

■ 革命人物

- 78 伟绩载党史 丰碑留民间
——吴毓传略
- 83 山门菁英 长湍女杰
——林心平传略

■ 志说温州

- 89 蟠龙在湾 魅力之城
温州市龙湾区地方志研究室

■ 诗意温州

- 92 文旅九山，感知瓯江山水诗路
章方松

封 二：图片报道
封 三：王振鹏《江山揽胜图》局部线描
封底篆刻
蓝 潮

温州史志

2022年第1期
(总第138期)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主办单位：

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温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温州史志》编委会：

主 任：王文胜
副主任：赵万磊 魏仕阔 吴 华
张声和 张致光
委 员：张林洁 郭东升 周婷婷
厉 靖 陈 好 康丽跃
金 默
主 编：王文胜
执行主编：吴 华
副主编：张林洁
责任编辑：陈 静 李 亮 饶晟吉
校 对：杨建明

地 址：温州市行政中心一号楼
电 话：88968780
传 真：88968777

E m a i l : wzds@zjds.org.cn

邮政编码：325009

出版日期：2022年3月

刊 号：浙内资准字第C044号

印 刷：温州市北大方印务有限公司

声明：除作者另有声明，本刊对来稿有权修改。来稿文责自负，因原稿问题引起的侵权纠纷，本刊不负连带责任。来稿凡经本刊使用，如无特殊声明，即视为已许可本刊进行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等，相关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作者向本刊投稿即视为同意上述声明。

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积极在全市发展大局中展现史志作为

◇ 王文胜

温州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清廉建设高地市域样板”的新目标，彰显了我市未来五年继续推动党的建设迈上更高水平的决心和信心。我们要全面对标市委决策部署，找准党建助力中心工作的载体和路径，推动各项工作穿透式落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成推动史志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助推“红动浙南”热潮。

一、以两个深度融合发挥党建统领全局作用

党建与发展融合互促，是做好党建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我们要积极推进党组织活动方式、活动载体和工作机制的创新，使党建有效融入中心工作、融入党员需求、融入群众关切，推进党的领导持续改进。

一是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

坚持“党有所需，史有所为”，自觉把党建工作融入到史志主业中来，将创新组织活动作为指导推进和检查督促党员干部工作的重要手段，将党建与业务同部署同落实，通过及时反馈、总结工作和思想交流，破除工作瓶颈，创新工作方法，谋划发展思路，提高党员干部完成工作任务的自觉性和抓落实的主动性，全力推动重点工作落实落细，在推动业务工作上充分体现党建工作的成效。

二是党建与队伍建设深度融合。充分发挥党建思想引领作用，积极利用载体丰富的党建形式抓好干部队伍素质建设，把重大项目推进、重点任务落实与组织建设、人才培养结合起来，强化理想信念教育，强化政治理论和业务能力学习，强化党风廉政建设，加强政治关怀、思想关怀、精神关怀和生活关怀，促进党员干部提升

政治本领、学习本领、业务本领，始终保持队伍的先进性、纯洁性、创造性和开拓进取的精神状态。

二、以“三微”载体平台促进党建工作机制创新

党建创新的重要目标，是找准史志工作服务中心、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的契合点。我们可以通过打造“三微”平台，把学习型、服务型、廉洁型党组织建设的要求融为一体、做在日常，使党员干部人人参与，结成有机整体，增强向心力凝聚力战斗力。

（一）依托“史志微讲坛”强化理论和业务学习。组织党员干部多途径拓展学习方式，形成“人人学政治、个个精业务”的浓厚氛围。其中“主任微讲坛”由室领导开展理论授课，采取理论研讨、专题党课等形式，引领带动机关党员干部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处长微讲坛”由处（馆）长开展业务理论专题讲座，以分析研究解决工作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业务相关知识经验分享为主要内容，促进党员干部共同提升业务素质和能力。“党员微讲坛”由全体党员开展学习交流，分享理论或业务成果，交流工作、学习、生活等方面心得体会。

（二）通过“史志微服务”开展“三为”专题实践活动。“三为”活动要立足史志工作职能特点和优势，以“强业务指导、强党史宣教、强结对帮扶”作为主要抓手。一方面是做好涉党史题材的书籍、展览、影视作品等审读审看工作，发挥好党史网站、杂志、新媒体等平台作用，从精神文化层面满足人民群众对更高品质生活的追求。另一方面是以社区为主阵地，开展党课宣讲、文明创建宣传、史志知识普及，以及关爱帮扶、环境整治、垃圾分类、平安建设等志愿服务活动。要提高党员志愿服务组织化程度，在职党员志愿服务活动参与率、从事志愿服务时间达到规范要求，且在“志愿汇”平台上有志愿服务时长记录。

（三）推行“党纪微考堂”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继续签订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和意识形态主体责任工作要求》责任书，每季度研究党风廉政工作，每半年召开全面从严治党专题会议。强化党章党纪党规意识，每年开展一次机关党员干部党规法规测试，实施一次岗位风险自查和督查，开展一次廉政谈心提醒，至少组织一次党风廉政警示教育，筑牢党员干部思想堤坝。

三、以细化五个层面任务健全党建目标责任体系

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必须明确责任目标，在各层面将党建工作任务细化分解，打造横向联动、纵向一体的责任链条，构建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同研究、同部署、同考核的工作格局。具体要落实五项责任。

（一）室务会议负主责。包括加强对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的领导，贯彻落实市委决策部署，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强化党章党规党纪学习教育督查，支持纪检监察机关开展监督执纪问责，领导机关党支部和群团工作等措施，落实室务会议的党建主体责任，主要领导履行抓党建第一责任人职责。

（二）班子成员负线责。室领导班子成员通过认真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和意识形态工作各项任务落实，坚持在研究业务工作时同步研究党建工作，抓好分管处（馆）的党建工作，指导督促分管处（馆）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根据分管工作的实际落实廉政风险防控措施等，抓好分管条线职责范围内的党建工作，按求落实“一岗双责”。

（三）处馆领导负块责。包括把党建工作的部署细化为具体措施，扎实开展党小组活动，对处（馆）人员加强教育、管理和监督，根据处（馆）工作特点做好廉政风险防控等，落实处（馆）长对处（馆）党建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职责。

（四）岗位人员负点责。各岗位人员在本职工作中落实每个工作节点的职责，包括在工作中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积极参加“三会一课”和各种学习交流活动，根据岗位特点认真排查廉政风险，对发现的问题和薄弱环节及时整改完善等。

（五）机关党支部负专责。机关党支部作为党建工作的专责机构，责任内容包括经常性研究、布置、检查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情况，做好经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对党员进行教育、管理、监督和服务，定期对党员干部开展廉洁从政教育，指导各处（馆）排查廉政风险点并制定防控措施，领导机关工会、妇女组织等群团组织并支持其积极开展工作等，负责组织推动党建任务落实。

四、以推进五个重点项目提升党建工作质量和水平

实施项目化管理，是推动各项

工作穿透式落实的具体体现。我们要围绕全面建好组织、队伍、品牌、保障、责任、执行体系，把党建重点任务和难点问题细化为具体项目，全力推动党建与各项工作互融共促。

（一）政治建设铸魂立根。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引领党员干部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一是强化理论武装。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以党的二十大召开、“八八战略”实施20周年等重大时间节点为契机，充分利用各种形式和手段，广泛深入开展学习宣传教育活动。二是强化对标落实。全面系统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和地方志工作的重要论述及对温州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定期组织开展贯彻落实情况“回头看”，结合史志工作实际，逐条逐项抓好落实。三是强化专题教育。深化“两个分量有多重”专题教育，选树“最美史志人”等优秀典型，推动党员干部在联系思想实际、改造主观世界、结合岗位职责、指导推进工作上悟初心、守初心、践初心。四是强化红色引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

深化党史研究，讲好党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

（二）中心工作推进保障。围绕市委市政府重大目标、重要工作、重点任务，以党建引领推动资源力量全面融合，激发干事创业热情，为中心工作提供有力保障。一是高质量服务全市工作大局。全力服务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发挥专职部门、专业队伍的优势和作用，宣传宣讲好党的二十大精神。积极开展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温州生动实践的研究阐释，组织开展“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探路’共富”研究宣传活动。二是高质量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根据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精神以及上级党史和文献部门的最新要求，统筹推进市、县（市、区）党史三卷编写工作。积极做好全市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立法调研的协助配合工作，持续推进我市红色资源挖掘保护、开发利用和展示展播。持续深入开展“三为”专题实践活动，提升服务群众能力，畅通服务群众渠道，放大资政育人功能。三是高质量开展城市发展宣传和历史文化传播。抓好志鉴质量提升，创新史志文化传播载体方式，发挥好温州革命历史纪念馆宣教主阵地和六大宣教

平台作用，启动《温州大典》编纂工程旧志典校项目，并结合开展村志编纂，深挖地情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助力乡村振兴。

（三）组织体系扎根固盘。织密建强党组织体系，完善党组织运行机制，使组织形态与史志事业发展形态更加耦合融合。一是提升支部战斗力。以抓好基础建设推进党组织整体规范提升，加强党支部的基本组织、基本队伍、基本活动、基本制度、基本保障建设，不断完善党支部工作的内容、流程、方式和工作机制，增强充分发挥“前哨”“探头”作用的能力。二是扩大党建覆盖面。积极探索组建“小微支部联盟”，以组织联建、主题党日、史志档案整理、“史志七进”、村社文化阵地建设等形式，丰富支部活动内容，激发支部活力。加强机关工会委员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和妇委会组织建设，丰富机关文化生活。三是打造双强新示范。结合启动村志编纂，与重点村进行支部共建，开展乡村文化遗产资源调查和收集整理，留存乡村文化记忆，共同营造乡村自治、法治、德治的良好氛围。大力推进“共享社·幸福里”建设，积极将史志力量资源下沉小区，有针对性面向群众开展“红色

巡展”“红色宣讲”“红书漂流”服务活动。做好党员进社区为群众服务工作，努力干成几件群众看得到、摸得着的民生“关键小事”。

（四）塑造变革能力提升。强化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努力建设变革型组织、提高党员干部塑造变革能力。一是不断提升洞见力。坚持用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规范行为，坚定理想信念，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分清是非，打好意识形态主动仗。二是不断提升执行力。深入开展“对标比学、对标找差”活动，认真查找在发展思路、工作举措、精神状态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建立基层支部联系点制度，抓实调查研究，抓好成果转化。三是不断提升创新力。树立数字化思维，加快融入全省党史、地方志数字化改革工作体系和工作大局，推动史志工作整体智治、高效协同。四是不断提升整合力。鼓励“走出去”开阔视野，加强“请进来”传经指导，加强与宣传思想战线、社科理论战线等部门单位的联系合作，组织运用好“三支队伍”，加快形成工作协同机制。五是不断提升学习力。强化政治理论、业务能力和新理念新技术新知识学习，用好用活“史志微

讲坛”平台，通过轮流领学、专题研讨、体会交流等方式，使每个党员干部成为学习活动的设计者、参与者，引导党员干部强化主体意识、提高党性修养、拓展业务素质、增强工作本领。

（五）清廉建设纵深推进。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制度，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巩固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一是全面开展纪律教育。整合教育资源，创新教育方式，用好反面教材，深入开展党章党规党纪专题教育，构建优化党风政风长效机制。二是严格执行六大纪律。坚持将政治纪律、组织纪律摆在突出位置，带动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全面从严从紧。加强党内政治生活、选人用人、个人重大事项请示报告等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三是加强“三重一大”风险防控。坚持重大决策、重要人事、重点项目和大额资金使用由集体充分讨论决定，并按照规定要求做好报备工作。四是深化廉政风险排查。分析确定年度廉政风险防控项目并进行重点防控，构建系统严密的监督管理制度体系。五是强化日常监督。立足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深入开展谈心提醒，及时把握党员干部思想动态，发现问题及时制

止、违反纪律及时处理。六是实施主体责任履行情况告知制度。紧盯机关干部出现的苗头性或违规违纪问题，以及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等问题，以书面形式抄告分管领导，由分管领导督促责任处（馆）抓好整改，落实全程跟踪监督机制。

五、以强化组织保障构建党建工作长效机制

加强党建工作，是我室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的重要举措，也是我室大力实施“红色根脉强基工程”的重要载体。我们要高度重视，把它作为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的有效抓手，统筹兼顾、精心部署、周密安排，确保工作落到实处，取得预期效果。要按照实现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的目标要求，落实工作载体化、载体项目化、项目清单化、清单节点化、节点责任化的工作机制，把各项工作措施进一步细化为任务清单、节点清单、责任清单，明确目标任务、时间节点、责任人员，对照清单逐级压实责任，建立项目台账，加强过程管理，精准化推进实施。要探索建立可衡量、可评价、可检验的考核指标，把党建基础工作和年度中心工作、重点工作分类细化纳入年度考

核指标体系，构建考评党建看发展、考评全局看党建的评价机制。要定期对落实党建责任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开展处（馆）党建工作评议，建立评议问题和整改落实台账，推进整改问题的督促落实。要在近年来机关制度建设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制度体系，规范工作流程，以制度成果推动工作常态化、长效化。

做好党史工作，本身就是在抓党建；发挥存史、资政、育人的重要作用，更应自觉抓好党建。作为史志部门，我们应更加牢固树立党建领路

的理念，把党建工作作为史志工作的重要环节切实抓好。同时党建工作关系到干部成长，是促进党员干部提升政治本领、学习本领、业务本领的工作，无论如何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要坚持把党建工作岗位作为培养锻炼干部的重要平台，积极推动党建工作经历纳入相应待遇等政策落实，鼓励政治强、业务精、作风好的干部从事党建工作，努力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

〔作者单位：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志办）〕

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在市委党史研究室各党员干部中也引起热议：

黄道沈：我们要切实把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贯彻落实到写史修志、资政育人的全过程、全领域、全方位，广泛凝聚落实紧扣一条主线、实现“六个先行”、推进“四大振兴”的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的共识共为，立足本职岗位，大力提升党建工作，高效推进工会工作质量，以实干实绩体现担当作为，把份内的工作与史志工作深度融合、相互促进，切实在市委的期盼要求中展现担当、彰显价值。

（综合处）

林依俐：近年来，温州党组织团结带领温州人民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奏响凯歌，在创新创业中奋勇拼搏，在脱贫攻坚征途上砥砺前行……生动演绎了这座创新之城、大爱之城的“温州速度”“温州力量”和“温州故事”。新时代赋予新使命，新使命呼唤新担当。我们相信，只要牢记嘱

托、勇担使命，唯实惟先、善作善成，必将会把总书记殷殷嘱托转化为温州发展的生动实践，在新时代的大考中书写精彩的温州答卷。

（编研一处）

康丽跃：报告系统总结过去五年温州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如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两个健康先行区的建设、大建大美、大干交通等，在年鉴中都是记述的重点。会议确定的“一条主线”“六个先行”“四大振兴”“十项重点举措”也必将成为未来年鉴编纂的重点和热点，乃至三轮志书编修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学好报告和领会党代会精神对于志鉴编纂的开展具有方向性的指导意义。

（编研二处）

李 亮：细读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全文，发现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是“发展”与“建设”，分别是106次和103次，由此可见市委对温州蓬勃未来的期盼和决心。城市的发展与建设从来不是一蹴而就，而是要由一个又一个阶段的努力与奋斗焊接而成。报告不仅仅是一张精美的蓝图，更是一本如何绘制蓝图的说明书。精密细致的蓝图，配上这样真抓实干的奋斗，温州一定能把创新史续写好、在共富的道路上昂首走在最前列。

（宣教处）

任 武：学习报告的过程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实现“六个先行”，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市。“六个先行”视野高远，内涵丰富，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温州为何要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市，怎样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市的时代之问。作为一名史志工作者，更应该立足本职工作，不忘初心，在传承和发展中践行使命，充分发挥党史资政育人的作用，为温州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市作出更大贡献。

（温州革命历史纪念馆）

千年商港的近代化历程

◇ 温州文史馆

清康熙廿三年（1684），清政府诏开“海禁”，允许浙江等沿海从事渔业贸易等海上活动，并在浙江设“浙海关”，温州是其下辖的15个关口之一。此后，港口经济在经历顺治“海禁”萧条后得以复苏和发展。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以及中英不平等条约《烟台条约》的签订，温州被列入贸易港口，设置海关加以把控。

当年他们为什么选择温州开埠？给百姓经济生活带来哪些影响？温州是怎样近代化的？

觊觎温州港城 海外资本寻求商品市场

清光绪二年（1876），中英不平等条约《烟台条约》签订，温州被列入开放港口。光绪三年（1877）2月18日，温州海关建立，先称温海关，半年后改名为瓯海关（新关），选址在城区朔门外、大码道附近的沿江岸



1877年瓯海关税务司公署

边。英人好博逊为首任税务司。瓯海关内设邮政处，兼办内部邮递业务。

而在此之前，温州已一再受到英美等国的觊觎和窥探。

道光廿年（1840），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两年后，长驱直入的英军，逼迫清廷签订《南京条约》。在提出“五口通商”的初期，温州已成为他们的觊觎目标。《条约》中，通商的“五口”有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在时任英国驻华公使J.F.Davis（德瑞时）眼里，东南沿海的港口贸易情况并未达到他的目标。为寻求更好的贸易商港，他试着通过谈判，再获得福州和宁波之外

的其他沿海港口。

道光廿三年（1843），英国海军在瓯江口对进温州港的航道进行测量。咸丰三年（1853），又有3艘军舰驶入温州港进行窥探。英国海军经过勘测，发现温州港“潮水涨至海岸时，一大批小船和许多中国人躲进了一个安全而又方便的避风港。我们的商船容易驶进贸易现场，早被认作是我们同中国通商最重要的贸易条件”。

J.F.Daris（德瑞时）也认为：“我们同中国的四个沿海省份进行贸易，实际上看来四省中的每个省都是要有一个好港口。广州港口和香港很近，位于其本省；厦门港口（福州港口除外）在福建；上海港口在江苏，四个省中三个有了。剩下的唯一缺陷是在浙江省沿海少一个位于江苏的上海和福建的厦门中点处左右的良港。浙江省的温州府城正好适合这条件……”

咸丰四年（1854），英美两国提出至少要开放温州港等要求，被拒；7年后，普鲁士政府也要求开放温州为通商口岸，仍被清廷拒绝。

尽管一再被拒开放，但晚清时期的温州港，因为物产丰富、良港天成及潜在的商品市场，在外国资本家眼里如“宝珠”般闪亮，无法忘怀。到同治七年（1868），《中英天津条

约》10年期满依规修约，英美又提出增开温州为口岸，后因故搁浅。光绪元年（1875），因云南边境发生“马嘉理事件”，被要挟的清廷于第二年签下《烟台条约》，温州成为新开辟的4个通商口岸之一。

外轮进港

洋行洋货渗透温州城乡

光绪三年（1877）4月1日，温州海关正式开埠运行，关址位于温州城北门（朔门）。港口制定管理章程，此后又在引水管理、航道测量、航线开辟、卫生检疫等方面作了规范，从而结束古老港口帆船加码道的状态，温州港城开始走向近代化发展。

英国怡和洋行的“康克斯特轮”是第一艘驶入温州港口的外国轮船，满载棉布等洋货从上海抵温，打响倾销商品第一枪。此后，外轮频频载货进入温州港。次年四月，中国招商局永宁轮也自沪首航抵温。海上航运业日益兴盛，温州港陆续开通与宁波、福州、厦门、汕头等沿海港口，南通、镇江等长江沿岸港口，以及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家和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航线等。

于是各地洋行纷纷来温设立机



洋轮停泊瓯江

构，数量多达35家。其中，英国13家、美国10家、日本9家、德国2家、法国1家，当时的温州城已是“瓯为海国，市半洋商”，知名的有美国美孚火油公司、英国亚细亚火油公司、英美烟草公司、英瑞炼乳公司、太古白糖公司及日本的广贯堂、东洋堂等。

随着轮船参与运输、洋行机构的设立，外国倾销温州的商品越来越多，从城区逐步向乡村、山区扩散。在进口洋货中，价值位列第一的是洋布（棉布），其次是洋纱（棉纱）、洋油（煤油）、洋糖（白糖）、洋烟（卷烟）、洋火（火柴）以及洋钉、洋针等，渗透百姓生活。被打开大门的温州社会发生巨大变迁，本土剧作家洪炳文为此写下24首《新竹枝词》，现摘录3首如下：

和议初成海禁开，美欧互市擅雄财。
自从瓯埠通商后，屡见洋轮鼓浪来。

沪上航通甬与瓯，椒江更复驶轮舟。
双门早已开商埠，更见东门筑码头。

汽笛呜呜晓色寒，寒烟一缕向空盘。
永宁桥外莲桥畔，又有湖轮到瑞安。

轮船往来频繁、内河外海俱相连通，温州港的经济腹地逐步扩大，物资运送也更加便捷，百姓充分体会到“邮路于今世界通”（芙蓉吟馆主人《新竹枝词》之三）的新气象。

鹅眼青蚨错杂行，利权从此判虚盈。
无端番饼分三品，圆法何由适重轻。

这首《竹枝词》道出当时洋钱流通温州的状况，其中“番饼”指的就是洋钱，坊间也称为“银番钿”，有印洋、糙洋、光洋之分，这显然是海外贸易背景下出现的社会现象。不仅是钱币流通的改变，随着西风渐盛，人们的服饰开始西化、色彩变得多样、洋酒西餐受青睐；新式报章杂志广泛刊行，在传播文明、启迪民智方面发挥巨大作用。女性开始接受新教育、迈出闺阁走向社会，甚至出洋留学；卫生观念、新式礼仪等也被广泛接受——温州人的衣食住行及观念各

方面都发生了较大变化。

自然经济瓦解 百工之城重新洗牌

从光绪三年（1877）至民国8年（1919）的40多年间，温州进出口总额从263526海关两（清代中晚期海关使用的记账货币单位）增至4062117海关两，翻了将近16倍。温州出口商品中，土特产主要有茶叶、纸伞、柑橘、烟叶、原木、明矾、滑石器、猪油等。1920年至1930年，温州港出口货物，除了茶叶、纸伞、柑橘、烟叶、木板、原木（木段）、明矾、滑石器、猪油外，还有鲜蛋、草席、菜籽、桐油、屏纸等。开埠以来，茶叶一直是温州最主要的出口商品，大部分通过上海远销欧美各国。纸伞则销往日本、南洋等地；产于平阳矾山（今属苍南）的明矾，销往全国各地。

据《1877—1919年瓯海关贸易册》载，温州进口主要商品为上文已提到的棉布、金属、煤油、糖类、火柴、鸦片等。其中1878年净进口额为20.3万海关两，此后快速增长，至1888年达60.5万海关两，各类进口商品均有大幅增长。在1888年至1893年之间，进口量有较大幅度下降。此后十年除火柴外，其他进

口商品均有大幅增长，进口额达145.9万海关两。1903年至1908年，棉布、棉纱、金属、糖类等进口量有所下降，煤油、火柴呈强劲增长态势，进口额达158.4万海关两。

洋货的大量倾销，使得温州手工业受到严重影响。如大量（每年几万到十多万匹）进口的洋布，虽不如温州手造土布经久耐用，但胜在价格便宜，使得大部分贫穷百姓乐于接受。洋布之后，温州的土纱（棉纱）生产也受到廉价洋纱的强烈冲击，温州城乡家庭手织业和手工纺纱业逐渐走向衰落。此外，温州城乡其他手工业也遭到摧枯拉朽般的瓦解。如传统的蓝夹缬布染、红花染，这些以植物靛青、红花为染料的土染业，一直是城乡百姓喜爱的土布染色主流方式，有众多的染坊进行来料加工或成品出售。在外国进口染料的冲击下，传统染布业快速失去优势，大量劳力被迫失业，不少人背井离乡飘洋过海到国外谋生。

除纺织、布染行业，廉价的洋钉、洋针也大量流通，使温州传统行业中的优势冶铁行业逐渐走向衰落；洋油取代榨油业、洋火取代打火石和铁片、肥皂取代皂荚……温州自产自销的自然经济被迅速瓦解，城乡商品经济有了较快发展。一方面，传统优势手工行业慢

慢失去优势甚至销声匿迹，另一方面其他手工行业却受到欢迎。如台绸、石雕、木雕、纸伞、花席、锡器、刺绣、皮箱、木器制品等，纷纷走出国门，成为创汇糊口的行业。此外，温州本土民族企业也在与洋货竞争中兴起，织布业如西门泰布、机器制造如毓蒙铁厂，还有肥皂厂、火柴厂、纺织厂、锯板厂、电力公司、电话公司、邮政局等相继成立，进一步加快了温州城乡商品生产、流通，以及电力通讯等行业的发展。

码头腹地扩大 温州港进入长足发展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温州本土经济开始兴盛。温州港进出的船只日益增多，为方便停靠，出海口沿岸先后建起多座码头。

温州港的到港轮船，以前大都锚泊江中，依靠舢板船接送旅客或过驳货物到岸，条件比较简陋。光绪十年（1884），轮船招商局温州分局在朔门建造温州港历史上第一座浮式码头，并安装钢制趸船，即招商局码头，也就是后来的朔门一号码头。从此温州港才有了可供大型轮船停靠、装卸货物的码头。

随着码头业务量的扩大，永川

轮船局、永宁轮船局等民办的轮船局也在温州设立了机构，建起一座座中西合璧、规模宏大的办公楼，成为近代温州代表性建筑。1916年，为使他们所属的轮船有固定码头停靠，宝华轮船局在新码道岸边建了宝华码头，也就是后来的安澜码头。1917年永川轮船局和永宁轮船局联合在化鱼巷江边设立永川码头。之后还有1933年建造的平安码头、1936年建造的株柏码头、1938年建造的振华码头等。

温州近代最早的民间航运企业是永川轮船局，旧址位于今鹿城区永川路9号。现存一幢坐北朝南，由门廊、耳房、正楼院墙组成的庭院式建筑。正楼系4间二层，南北两侧设外廊，方壁廊柱，柱间用连续券，由爱奥尼克柱承托。永川码头、永川路（原化鱼巷）皆由永川轮船局得名。

永川轮船局是1903年林希恒在宁波创办的轮船公司，拥有永川、定海、



永川轮船局旧址

湖广、海宁四艘轮船。1914年，开通甬（宁波）瓯（温州）水上邮路航线，由“永川”轮驶行，兼运坎门、海门、定海等地邮件。这条由永川轮船局开通的航线前后历时近30年，是温州近代最稳定的对外海运航线之一，标志着近代温州已经从一个中途靠泊的港口，成为运输目的地港。

1920年代以后，由于民族工业的兴起，火柴、肥皂、棉纱等被国货所取代，基本停止进口。在进出口货物上，土货出口比重甚至超过洋货进口。而在抗战初期的1938年，战火硝烟的夹缝中，偏处东南一隅的温州与抗战后方联系密切，路线上联通公路、瓯江水道，经金华衔接浙赣铁路，增强了温州港辐射能力。而随着腹地经济扩大、流通速度加快，温州港获得短暂辉煌时光：东门一带人货通行川流不息，呈现一派繁荣气象；温州城内也是商业兴旺、人才萃集，人称“小上海”。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战争推进，温州三次沦陷，多数码头遭到严重破坏。直到新中国成立，温州港终于迎来新生。

结 语

1957年2月21日，国务院批准温

州港为准许外国籍船舶进出的18个沿海港口之一，是当时浙江省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1984年5月4日，温州市被国务院列为中国进一步开放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之一。今天的温州港是我国沿海25个主要港口之一，在全国综合运输网中居于重要地位。港阔水深，风平浪静，平阳鳌江、瑞安飞云渡、龙湾状元、永嘉清水埠、乐清磐石等港口依次排布。特别是位于瓯江入海处的七里港，港口为不规则半日潮，平均潮差四五米，一般风力在六级以下，常年候潮可通航万吨客货轮，是东南沿海屈指可数的天然深水良港。2016年，温州港被纳入全省海港一体化发展，温州作为“南翼”重点布局，有了历史性突破。

在2022年2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温州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温州擘画“千年商港、幸福温州”美好图景。未来五年，温州将以“港”书写新格局，逐步建成集亿吨海港、国际空港、中欧陆港为一体的物流港、商贸港、金融港以及头部企业集聚、天下温商回归的总部港，数字制造、数字贸易、数字金融蓬勃发展的数字港。“港”通天下，“港”聚未来，期待温州更加美好幸福。

（执笔：金柏东）

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 示范区的几点思考

——以平阳县为例

◇ 王 祥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十九届五中全会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广大基层干部群众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近年来，平阳县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精神，坚决落实省委、市委系列决策部署，把共同富裕工作牢牢抓在手上，取得了显著成效。对照如何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以平阳县为例，应切实做好以下三点。

一、肯定成绩、正视问题，坚定抓好共同富裕工作的决心和信心

近年来，平阳县先后创成省级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省级畜牧业绿色发展示范县、省级现代生态循环农业整建制推进县、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放心县，获评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

县，成为“普惠金融+智慧县域”全国标杆县域。概括起来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产业越来越兴旺。大力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累计推进西部生态休闲产业带项目76个，总投资68.3亿元；建成乡村振兴示范带10条，“平阳五个鲜”品牌综合产值突破12.2亿元；粮食播种面积24.63万亩，产量1.03亿公斤，是全省22个产粮大县之一；生猪存量超15万头，自给率超80%，增产保供能力走在全省前列；创成省渔业健康养殖示范县，南麂入选全国农业产业特色强镇，平阳黄汤入选国家特色产业集群。

（二）村庄越来越宜居。大力推进美丽乡村、美丽田园和美丽庭院一体建设，创成一批美丽样板。其中，全国文明村2个、省级美丽乡村示范乡镇7个、3A级景区村20个、省级特色精

品村23个、“月亮工程”村8个、市级最美田园3个，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工作连续4年被省里通报表彰，生活垃圾得到集中处理、无害化卫生厕所、生活污水治理、村庄环境整治等覆盖全域，成功获评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

（三）农民越来越富裕。2020年底，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6736元，“十三五”期间年均增长9.1%，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1.97:1。坚决打好脱贫攻坚战，落实产业、搬迁、金融等系列帮扶措施，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年家庭人均收入8000元以下、集体经济薄弱村“三个清零”，真正让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

（四）改革越来越深入。一大批农村改革项目在平阳县落地、开花、结果，全市率先通过省市土地确权综合验收，新时代乡村集成改革获省级试点，“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农民专业合作社质量提升”获国家级改革试点，一鸣、佩蒂宠物入选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五）治理越来越有效。高质量完成村社规模优化调整，行政村由599个减少至359个，村均人口由1266人上升至2106人，全面重构了基层治理格

局。高质量完成村社组织换届，“一肩挑”人选100%当选，参选率、得票率均创历史新高，村均信访量0.1件，系全市最低。高质量推进基层阵地建设，累计创建善治示范村90个、建成建制村文化礼堂284个、创成党建示范村249个、实现乡贤馆全覆盖，党的执政根基得到进一步夯实。

与此同时，平阳在共同富裕工作的推进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和短板：

（一）均衡发展的水平还需进一步提升。平阳县域呈东西狭长型分布，东部乡镇发展水平明显高于西部。在经济发展上，2020年，东部昆阳、鳌江两镇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35亿元（全县200亿元），分别占到全县的67.5%和60%，而西部绝大部分属革命老区投入方面差距十分明显。在优质服务供给上，东部乡镇集中了全县80%以上的优质学校、优质医疗资源，而占县域面积近一半的西部地区，优质公共服务资源的供给明显不足。在基础设施上，特别是制约西部山区发展的交通问题尚未真正解决，瑞平苍高速建设才刚刚启动，西部乡镇之间的“互联互通”仍存问题，山区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

（二）乡村振兴的力度还需进一步加大。群众增收方面，截至2021年

4月，全县仍有低收入家庭13921户，22167人，去年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12214元，比全省平均水平低2151元，增收帮扶的任务依然艰巨；保障配套方面，“四好农村路”建设水平、优质幼儿园覆盖面等方面还处于全省26县中下水平。

（三）农村环境的整治还需进一步强化。近两年，平阳扎实推进农村环境整治，农村面貌有了很大改善，但对照“全域美”标准，还有较大差距，全县现有保洁员900多人，低于标准规定，保洁力量严重不足；农村保洁经费年人均不足40元，低于省定标准，长效保洁机制还需逐步完善。

二、深刻领会、准确把握，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共同富裕工作上来

省委十四届九次全会对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部署，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为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平阳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重点要把握以下四个方面：

（一）在准确把握理论内涵中坚定推动共同富裕的政治定力。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光荣使命，是我们浙江忠实践行“八八战

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的核心任务，是扛起“五大历史使命”的总牵引，也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2020年春天，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时，赋予浙江“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的新目标新定位；2021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又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定题、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战略决策。我们必须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不断增强理论认同和政治定力，在奋斗“十四五”、奋进新征程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以标志性成果展现践行“两个维护”的政治担当。

（二）在准确把握本质特征中找准推动共同富裕的正确方向。全会指出，共同富裕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一种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并从五个方面系统解释和分析了共同富裕美好社会的社会形态，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指导性，是推动共同富裕的方向指引。我们必须在认真学习和深入实践中不断拓展深化对共同富裕社会形态的认识理解，准确把握其政治属性、基本属性和本质特征，结合平阳实际，坚持党的领导，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聚力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统筹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推进公共服务优质共享，确保平阳共同富裕进程始终朝着正确方向探索前行。

（三）在准确把握目标任务中细化推动共同富裕的具体要求。全会明确了示范区建设的目标任务，总的是按照“每年有新突破、5年有大进展、15年基本建成”的安排压茬推进。过程中将滚动制定五年实施方案、迭代深化目标任务，推动形成阶段性标志性成果、普遍性经验，这充分体现了省委推进示范区建设的清晰思路和科学方法。全会审议通过的《实施方案》，坚持国家所需、浙江所能、群众所盼、未来所向，为我们擘画了未来5年乃至15年探索建设共同富裕美好社会的蓝图，明确了创造性系统性落实示范区建设的各项目标任务，为我们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必须对标对表、逐项分析，细化梳理平阳县推动共同富裕的任务要求，科学构建目标体系，力促实现新突破，为全省的示范区建设贡献更多平阳力量。

（四）在准确把握实践路径中谋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抓手举措。全会指出，“十四五”时期是示范区建设

的“第一程”，是更宽领域更高层次转入创新驱动发展模式，实现高质量发展、竞争力提升、现代化先行的关键期。全会强调，要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夯实共同富裕的基础，找准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点、难点和关键点，着力抓好重大改革、重大抓手和重大政策，具体从8个方面部署了创造性突破性的重大举措，为推动共同富裕指明实践路径。我们必须认真对照这8个方面重大举措，逐条逐项谋深谋实平阳县推动共同富裕的载体抓手和落实举措，持续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以省委各项决策部署的落细落实，推动平阳高质量发展。

三、深入谋划、狠抓落实，在全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中走在前列

省委全会作出的系列部署，是抓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工作的重要遵循。平阳要坚决贯彻落实省委全会精神，深刻领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丰富内涵，全面对标《实施方案》，切实扛起使命担当，在共同富裕中先试先行，加速实现赶超发展，为全省大局多作贡献。重点要聚焦实现“四个共”：

（一）聚焦实现“共富”，全力夯实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共同富裕，经济发展是基础。省委全会提出，要打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组合拳，推进经济高质量先行示范。要坚持把经济发展作为第一要务，不断做大经济“蛋糕”，夯实共同富裕的发展基础。一要以工业强实力。工业是平阳经济发展的主心骨，也是推动共同富裕的最大底气。要坚定不移实施工业强县，深入落实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和新兴产业培育“双轮驱动”，加快打造“五大百亿产业集群”，不断推动平阳工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奋力向千亿工业强县迈进。二要以项目增动力。人才、资金等要素向发达地区、大城市集聚是发展大趋势，对平阳县来说，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不利因素。要想实现要素的逆向回流，只能利用“大抓项目”。要始终把项目招引作为“一号工程”，紧盯“两新一重”和重大产业项目，再谋划落地一批省重大产业项目、省152项目，加快正威、金茂等重大项目建设，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的“家底”，以产业项目布局改变要素流向，实现平阳跨越赶超。三要以创新添活力。省委全会提出要更大力度实施人才强省、创新强省首位战

略，以科技创新和数字变革催生新的发展动能。对平阳来说，创新能级不高、能力不强，更要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积极融入全市科创高地建设，特别是要集全县之力建设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加快构建“1+10”科创体系，系统提升创新平台能级，激发共同富裕的强劲动能。四要以旅游挖潜力。旅游是富民产业，是“两山转化”的主通道、实现共同富裕的主抓手。要多思考，深入挖掘平阳丰厚的红色、绿色、蓝色、古色“四色”旅游资源，持续优化全域环境、健全旅游配套，做深做实文旅融合、农旅融合、体旅融合、工旅融合、红旅融合文章，全力打通“两山转化”通道。

（二）聚焦实现“共享”，全力擦亮共同富裕的民生底色。省委全会报告提出，着力推动人的全生命周期公共服务优质共享，瞄准人民群众所忧所盼所急，率先高水平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平阳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民生提质”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进一步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一要加快构建优质均衡的基础设施体系。公共基础

设施直接服务人民生产生活，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基本抓手和重要前提，要想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要有与之相匹配的基础设施。要大兴水利，加快推进南湖分洪工程等重大水利项目，加快形成水头镇区“疏堵结合”防洪体系，确保安全度过汛期。要大干交通、干大交通，特别是加快推进瑞平苍高速建设，尽快结束平阳北港40万人不通高速的历史，全面融入3个“1小时交通圈”。二要加快构建全民普惠的公共服务体系。公共服务尤其是人民群众最为关心的优质教育、优质医疗，必须要突出普惠性，真正做到全民共享。要优化教育供给，积极创建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进一步打响“学在平阳”品牌。要优化医疗供给，深入实施“健康平阳”战略，全速推进县中医院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形成“多层次、广覆盖”的基层医疗服务体系。三要加快构建面向未来的品质生活体系。重点要抓好未来社区、未来乡村两大载体，全面提升群众的生活品质。未来社区建设方面，要在加速推进鳌江西塘未来社区建设的基础上，谋划好后续未来社区的建设地点，加快形成梯队式培养计划，争取快出经验，为全省提供平阳样板。未来乡村建设方面，要以打

造“五化十场景”为切入点，高标准推进昆阳、凤卧2个市级试点，每个乡镇建设县级试点，让未来乡村成为乡村振兴的示范样板。

（三）聚焦实现“共情”，全力提升共同富裕的精神内涵。省委全会报告提出，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深入实施新时代文化浙江工程，不断提升全社会文明素质。要坚持“以文为魂”，进一步加强文化建设，为推进共同富裕、实现跨越赶超发展提供价值引领和精神支撑。一要守好红色根脉。平阳是省一大召开地，红色资源得天独厚，这是我们的根和脉，必须要传承好、发扬好。要加强红色文化研究，用好省一大会址、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园、抗日救亡干部学校等红色资源，讲好平阳红色故事，进一步打响平阳红色品牌。要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开展好“万名党员进党校”“千场党课下基层”等活动，全面造浓学习氛围，加快推动学习常态化。二要创设文明氛围。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更是共同富裕必须要实现的内在要求。要全面深化全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全力抓好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加强文明村镇、文明家庭等文明“细胞”培育，严厉整治婚丧礼俗大操大办、占道搭棚等陈规陋习，全面提升群众精神文明素养。三要坚持以文育人。要充分发挥“千年古县”的文化优势，不断深挖平阳历史文化内涵，加快推动县“四馆一院”、村文化礼堂等一批文化设施建设，持续扩大公共文化服务半径，巩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成果，加快打造温州南部文化引领示范区。

（四）聚焦实现“共治”，全力夯实共同富裕的治理基石。省委全会报告提出，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富民与安民，加强应对风险社会的机制和能力建设，构建舒心安心放心的社会环境，持续打造最安全最公平最具活力的省份。平阳要持续深化“平安平阳”建设，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以智治手段优化治理形态、完善治理模式、提升治理效能。重点要把握“三个关键”：一要抓住党员干部这一关键群体。要大力实施红色细胞2.0版，深化“党员志愿服务+”活动，特

别是要深入开展“初心启航之地·红色志愿之城”创建，广泛发动党员干部带头抓服务、解难题，实现干部带党员、党员带群众。二要打造基层堡垒这一关键阵地。村社组织不仅是贯彻落实党委政府治理决策部署的最基层单元，也是实现基层社会共治的中坚力量。要打好“治村指数”“兴村报表”“比学擂台”组合拳，加快构建“党建+信访”体系，积极探索“党建+”治理模式，真正把基层治理的责任落下去，把基层的战斗堡垒作用发挥出来，为实现社会共治打牢基层基础。三要用好数字赋能这一关键手段。要坚持数字赋能，以系统思维、系统理念，迭代升级原有改革、推动改革系统集成、在更大场景中谋划改革，高质量构建“1+5+2”工作体系，以数字化全面重构基层治理格局，全力构建与共同富裕示范区相匹配的社会共治体系。

〔作者单位：中共平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县地方志研究室）〕

挖掘党史资源 打造鹿城党建新风尚

◇ 王剑峰

党史文化资源是指在党的奋斗历程中所形成的伟大精神和物质载体，不仅包括了重要的党史事件、党史人物、党史遗址遗迹、纪念物等，还涵盖了党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温州鹿城作为浙南大地的中心城区，留存有丰富而宝贵的党史文化资源，是一方红色的沃土。如何用好党史资源，挖掘红色内涵，走出鹿城党建的地方特色与品牌效应，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重要课题。

一、挖掘梳理鹿城红色资源，贯通党的伟大事业在鹿城实践的丰厚素材，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重要内涵

鹿城的党史文化资源非常丰富，既有重要的党史遗址遗迹等实体，也有对浙江乃至中国革命和建设产生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以及由此折射出的革命精神。

（一）众多的党史事件

1924年12月，中共温州独立支部

（简称“温独支”）在温州城区信河街侯衙巷新民小学成立，开启浙南革命的光辉历程，也带动鹿城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浙南开展革命实践和理论宣传的核心区域。最早一版的《共产党宣言》，也因“温独支”7名早期党员之一的戴树棠传入温州，至今珍藏在温州市图书馆里，见证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历程。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温州地方党组织领导温州农民开展武装斗争，鹿城不少先进分子积极参与，涌现出不少的浙南游击队员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战士，英勇反抗国民党营造出的“白色恐怖”。

在抗日战争和国共合作时期，新四军通讯员往来于温州城区，党领导人民开展敌后抗日斗争，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和阻挠，留下了不少革命旧址和遗址。

解放战争时期，城区是温州和

平解放的重要活动区域。在党的领导下，不少开明人士和爱国者、和平起义组织者经过艰苦努力，终于迎来了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城区留下了不少道路、设施、桥梁和厂区等优秀的建设成果。在改革开放时期，城区是民营经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章华妹申领中国第一张个体营业执照；木杓巷市场、妙果寺市场和东方灯具市场，以及康奈鞋业等，共同构成了“温州模式”在鹿城区的成功经验，印证了中国改革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温州模式”和“温州人经济”由此酝酿和成长。

（二）重要的党史人物

“温独支”时期及其前后，谢文锦、郑恻尘、金贯真、胡识因、蔡雄和郑振铎等一批早期的共产党人在鹿城大地上留下他们的英雄壮举。1942年2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刘英也因叛徒告密在鹿城小南门被捕，于永康方岩就义。为和平解放温州城，涌现了一批共产党人及其爱好和平的起义者，包括龙跃、胡景城和王思本等，为温州的革命事业与和平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

（三）重要的党史遗址遗迹

党史遗址遗迹是党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历史见证。鹿城有大量围绕各

个时期形成的红色遗址遗迹与党史文物，如：中共温州独立支部成立遗址（侯衙巷新民小学）、西坑烈士墓及其纪念馆、浙南游击纵队纪念碑、浙南党组织庆年坊交通站旧址、新四军驻温通讯处九柏园头旧址、温州城区革命历史纪念馆以及瓯江大桥、人民路、妙果寺商场和东方灯具市场等。鹿城具有标志性的重要的党史遗址遗迹和鲜活的党史教材就有50余处。

纵观鹿城党史文化素材和红色资源，有其鲜明的地域性特点，也折射出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艰辛历程和非凡成就，体现了鹿城人民勇于牺牲、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敢为天下先、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品质。这些资源具有巨大的时代价值，是推动鹿城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对这些资源进行合理开发和利用，将会大幅度提高鹿城党史文化在浙江乃至全国的影响力，从而有效地发挥党史文化资源“存史、资政、育人”的功能。

二、以党史资源的鹿城特色为着眼点，构建中心城区的党建文化品牌

立足鹿城地方党史文化资源，为红色精神的宣传和深入人心提供直观性素材，增强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

感染力和说服力。

（一）发动群众，着重以民为本

要发动全社会的力量，深入挖掘鹿城地方党史文化资源，切实做好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工作。大力挖掘现有的和潜在的党史文化资源。当前往往重视革命纪念馆、博物馆、遗址遗迹等物质形态的资源开发，忽视对非物质形态资源的开发。这样的开发利用模式，只停留在较浅的层次。实际上，我们应该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主导理念，在党史文化内涵的发掘上下大力气，讲好红色故事，力求将党史文化中最根本、最宝贵、最感人的精神内质挖掘出来，传递给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达到巩固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主阵地的目的。

（二）一以贯之，着重实事求是

要做到从实际出发，具体做好各层次的保护和开发。对一些处于未开发或者半开发状态的资源，比如规模不大、知名度小、地理位置偏僻的党史文化资源，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和保护意识的缺失而易遭破坏，地方党史和党建部门更应该把保护工作放到应有的地位。保护好这些遗产，要尊重党的奋斗历史，尊重那些为了新中国的成立、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逝去的革命先辈。对待党史文化资源

的正确态度，要从史情出发，保护和利用并行，二者缺一不可。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原则，加强党史文化物质类资源的抢救性修复和保护，同时注意征集党史文化非物质类遗产，妥善留存、整理和开发、传播与利用。保护是利用的前提，只有保护得好，才能更好地加以利用。

（三）中西结合，着重现代情怀

要多形式、多手段、多渠道地加强对地方党史文化的宣传和推广力度，在把握意识形态主动权的同时，树立现代传媒意识，运用新手段、新技术，有针对性地开展宣传工作。以领导干部和青少年为重点，广泛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创新教育教学方法，推进党史故事进教材、进课堂，让教学内容真正入脑入心。比如，可以让大众走进西坑等革命园地，身临其境地感受红军当年的生存条件和战斗环境，就是非常好的教学和宣传方式；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网络平台，包括微信公众号、抖音平台等新型时尚多元媒体，精心谋划有影响的党史文化专题，不断推出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党史文化精品。

（四）立足实际，着重创新精神

利用节假日、纪念日等特殊时间

节点，开展党史文化资源的推介活动、纪念活动和庆祝活动。近两年，鹿城城区革命纪念馆参观人数不断增加，充分说明了各种活动的推广对相关纪念场馆影响力的推动作用。也可通过举办全省、全国性的研讨会，提升地方党史文化、红色资源的影响力。比如，通过不同层次的新四军研究会、历史学会和研讨会，扩大红色资源人文影响，加强社会教育受众面。

三、以史为鉴，立足当前，擦亮党史文化品牌，重塑鹿城党建新风尚

抓住浙江建设文化强省的战略机遇，充分利用省委推进党史强省建设的工作平台，进一步研究党史工作强区的策略和机制，运用这些地方性红色资源优势，更好地发挥党史及其文化基因在鹿城党建中的独特作用，不断提升党史文化的感召力和党建工作的影响力。

（一）引领时代新风，总结形成党建持续创新态势

党建工作要突出政治站位，通过党的历史发展的生动事实和共产党人光辉形象，进一步深化政治文明的清晰度和严肃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出台修订了一系列党内法规，鹿城

在贯彻落实方面创造了许多成功经验和做法，如机关党建质量指数的提出与逐步完善等。但是，在融入党史知识和党史教育方面还有不少有待填补和提升的空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内容融入方面。可以结合“温独支”历史学习和宣传，进一步充实建党精神的领会和融通，进一步加强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地方特色，既要“造形”更要“铸魂”，还要赋予具体事件的生动启迪，增加红色文化的熏陶和感化浓度，促进党员不忘初心，坚定信念，提高党性；也可以结合“温州模式”的兴盛历史和奋斗历程，近距离地感受时代前行的矫健步伐，帮助判断事业成功和留下的不足，充实共同富裕的思路谋划和建设途径、内涵，以进一步明确思路，凝聚人心，再领风骚。二是形式构建方面。可以通过“党建+党史人才培养”“党建+红色基地培育”等多种途径，搭建思想组织建设、党员学习教育和廉政警示教育，以及考察考核和验收机制的全过程、全视野、全数据，形成“党建+党史”的多元融合发展态势。

（二）依靠实事求是，探索党史党建融会贯通机制

“两新”党建是鹿城探索民营经济发展，融合新时代推进“两个健康”发展的有利方式和主要抓手之

一。在推进建阵地、强示范的支撑点上，要把鹿城地域特征的红色文化适机地融入党的组织建设、班子建设、党员管理、组织生活的全过程中，推进对标争先、示范引领。可以凭借地方党史资源来打造“红色党性套餐”，增强党员党性修养，充分利用党建图书、红色教育展厅、“温州独支”开创精神和“温州人精神”等，开展专题讲座、旧址现场教学、实践体检等；可以通过主题党日活动，组织党员“开展忆苦思甜红色记忆”“接受红色文化洗礼”“集体过红色政治生活”等，通过亲耳听、亲眼看、亲身悟的方式，深化“两新”企业党支部书记和党员们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党性教育，激活他们的红色基因和爱党爱国情愫；可以探索“红色故事”加入“微党课”的“套餐系列”，辅助加强“黄色警示”教育，强化企业人士的道德自律和遵纪守法观念。这样，才能不断探索并更好地形成具有鹿城特色的“两新”党建新思维和新机制。

（三）充分解放思想，实施党建引领党史品牌建设

可以实施党建引领党史品牌建设，在党史文化资源的利用上，坚持

“两手抓”的方针，既要抓公益性的党史文化事业，也要抓一些经营性的党史文化产业，并与旅游、房产、信息、传媒、影视等产业深度融合，构建“鹿城系列”党史文化产业链，以党史文化的发展直接促进党建品牌的树立，也积极推动地方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可以多角度地整合党史文化资源，把党史文化资源同发展红色旅游结合起来，开发一批精品红色旅游线路，扩大党史文化和党建品牌消费，并与自然、人文等类型的旅游资源相结合，形成综合性、复合型的旅游产品，整合出对旅游者更具吸引力的旅游线路，从而发挥党史文化资源的长期效益，推动营造党建品牌的时代新风尚。要以政府投资为主，同时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参与，加快培育一批富有活力、具有实力的党史文化企业，特别要在新科技新手段引领下积极探索发展文化创意、数字出版、移动多媒体、动漫游戏和影视等新兴党史文化产业，扩大党史文化产业的开发范围和丰富内涵。这样，既带动经济和文化的“双丰收”，又让游客切实感受到党史文化的熏陶。

〔作者单位：温州市鹿城区档案馆（区史志研究室）〕

《周官》即有学校与军制相辅

——读孙诒让《东游日记》叙

◇ 张声和

光绪己亥秋，日本大治兵于其国之木，欧美各国观战者四集。而闽沈丹曾观察以蜀帅奎公檄往，四阅月始归，记其所见，为书一卷。于兵事外，旁及工艺商务，而于学校尤详。盖观察以乔木世臣，负经世之学，故此行于审敌自镜之道，尤所致意。而以兴学与治兵理相通贯，则其义尤闳深，非一曲之士之所能识也。诒让不习兵事，而少治《周官》经，尝谓周之六军，出于六乡七万五千家，远郊之内，地不逾四同，而立乡学六、州学三十、党学百有五十，国学、郊学尚不与焉。其学制之详如是，斯非学校与军制相辅之义证乎？孔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教之云者，谓纳之庠序，而以德行道艺督课之，非第习击刺进退已也。百年以来，西国骤强，日本亦奋于东，其学堂之盛与兵力之强适相应。而吾国以不识字之将，率顽犷窳拙之卒以应

之，宜其不相当也。自甲午款议成后，深识之士始知兴学为自强之基。中外学堂林立，而论者不察，犹或斥为西法新法，不知以学校治军本《周礼》，乃中国二千年前之古法也。余读观察此书，既终卷，辄揭其微旨，而摭周官学制、军制以证明之，冀为讨论国闻者之助，岂徒侈游观之奇哉！庚子五月，世愚弟孙诒让谨叙。

以上是孙诒让为沈翊清《东游日记》所作的叙。

叙中提出的“于兵事外旁及工商尤详学校”“学校治军本自周礼”“学制为兵制之源”的观点，是百多年前温州学者对强兵强国的认识，至今仍值得思考。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秋天，日本在国内栃木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欧美各国派人去参观。当时在福建任职的沈翊清道员遵照四川总

督奎公的命令也前往观光，回来后写成一部书，名曰《东游日记》。书中的内容除了考察军事外，还涉及教育、商务、工艺等方面，而对于学校的记载尤其详尽。

沈翊清（1862—1908）字丹曾，沈葆楨之嫡长孙，与孙诒让是世交。沈葆楨又是林则徐的长女婿，丹曾家世显赫。光绪六年（1880），沈翊清入福建船政局，任职先后达20余年，历任总稽查、提调及会办大臣各职。光绪二十五年（1899）秋，四川总督奎俊提名文官以福建船政学堂提调沈翊清前往日本军队举行秋操，另有武官四川提督丁鸿臣前往，并带领福州船政学堂数名學生前行。

《东游日记》记述，沈翊清从福州抵沪，光绪二十五年（1899）秋从沪乘日船山城丸号出洋，前后三个多月。在日本期间，沈翊清重点考察了日本的军队、军校，参观了军队演习。详略得当地记述了参观日本陆军成城学校、地方幼年学校（士官学校之预科）、中央幼年学校、户山学校、军医学校等。并且观摩了成城学校士兵演习、户山学校的士官体操，以及陆军骑兵实施学校、近卫师团步兵第三联队、近卫师团骑兵联队、近卫工兵大队、近卫野战炮兵联队等部

队的演习。《东游日记》还记载了日本各种类型部队的构成、演习的场面，了解军校的课程设置。

其间，沈翊清还考察了日本工艺商务等情况，并往横须贺船厂察看日本所购置军舰如富士军舰、浅间军舰等。参观了炮兵工厂、东京卫戍医院。还观看了在青山练兵场举行的日本军队试演天长节日皇驾临观兵阵式。

《东游日记》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三月刊于福州。谢章铤札，戴鸿慈、孙诒让3位晚清学界名人作序，提高了《东游日记》学术价值。如谢章铤是位大学问家，曾任致用书院山长，陈宝琛、陈书、陈衍、张元奇、林纾等，皆出其门下；戴鸿慈是清末出国考察五大臣之一，近代中国第一位司法部长，他身历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官至礼部尚书、法部尚书、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正一品官阶；孙诒让为晚清经学大师、著名教育家，与俞樾、黄以周合称清末三先生。章太炎称他“三百年绝等双”，所著《周礼正义》为一生心力所瘁。

孙诒让《东游日记》叙，以中国经典《周礼》引申，溯中国文化之源，反思中日教育和军事的差距，提出强国思考，赞许沈翊清考察日本的成果。认为：“以乔木世臣，负经世

之学，故此行于审敌自镜之道，尤所致意，而以兴学与治兵理相通贯，则其义尤闳深，非一曲之士所能识也。”对成书意图极为推重。孙诒让认为沈翊清为我国累世功勋的大臣，有治理国家的学识，所以东游对于审察敌情反省自己方面尤其注意。认为振兴教育和加强军事的道理是相互贯通的，意义尤其博大精深，不是孤陋寡闻的人所能理解的。

沈翊清的《东游日记》保留了清末新政之前、维新运动之后国人对日本的观感以及对中国人出国学习的思考。中国人走向世界，首先要接受世界文明，要有世界知识，要有世界眼光。林则徐和魏源曾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学习外国的长处，以对付外国的侵略，于是林则徐编了《四洲志》，魏源编了《海国图志》，旨在打破国境，学习和了解外国。

孙诒让说自己虽未能亲身出国去考察，没有学习过军事，但他研究过《周礼》，就拿周朝的六军治军来说事。孙诒让说，用学校来培训军队《周礼》有记载，这是我国两千多年前就有的老办法。来自六乡七万五千户人家，地处偏远郊区，地方不超过四百平方公里，而有六所乡校、三十五所州校、一百五十所党校，国

立学校和远郊的学校还不在此内。这难道不是学校和军事制度相辅助道理的证明吗？

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去作战，是去送死，这叫做抛弃百姓。要把士兵纳入学校的轨道，用德行、学问和技能去教导他们，不是只学习用刀剑刺杀和前进后退的步伐罢了。一百多年来，西方各国骤然强盛，东方的日本也振兴起来，他们学校的兴盛和军事力量的强大相适应。而我国是任用不识字的将领，带领顽劣粗野、笨拙的士兵去对抗，不相敌抵是理所当然的。自从《马关条约》签订后，远见卓识之士才认识到振兴教育是国家强盛的根本，中外学校到处设立，而论者不考察，有的还骂这是西法新法。孙诒让采用周朝的军事制度教育制度来证明它，希望有助于研讨本国的传统学问，而不只是夸耀游览的奇闻。

光绪乙未，东事甫定，中国贤士大天始盡然有国威未振之惧。于是京都及南洋皆有强学书局之举，而瑞安同人亦议于邑城卓忠毅公祠开学计馆以教邑之子弟，皆以甄綜术艺，培养人材，导厥涂彻，以应时需，意甚盛也。夫时局之艰难，外变之环伺而

沓至，斯天为之也。然人材之衰薶（荼），学艺之不讲，朝野之间，岌焉有不可终日之虑，则人事或不能无过矣。

这是孙诒让《瑞安新开学计馆

叙》一段文字，写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从中可说明孙诒让先生对中国的教育发展、人材培养有“不可终日之虑”，对温州地方教育事业的殚精竭虑。

（作者系《温州市志》主编）

公益广告



泰顺古代乡绅对地方建设的贡献

——以《分疆录》为中心

◇ 谭桂涛

乡绅是一定地域范围内，凭靠在物质财富或专业技能、思想道德等方面的优势，从而得到较高知名度、社会地位、社会影响力与号召力的人。作为地方精英的他们，成为区域经济文化发展多元助推体系中极其重要的一环。

泰顺位处浙江南端，毗邻福建省。唐宋时期，以十八大姓为代表的大批移民迁入，发展步伐加快，在明景泰年间建县。在一代代先民的辛勤耕耘下，榛莽山林被开发成为桃源乐土。其中，乡绅群体的贡献不可忽视。围绕乡绅与地方发展这一问题，学界已有很多讨论，也结出累累硕果，但聚焦泰顺的论著尚显薄弱。笔者拟以泰顺为空间坐标点，以古代为时段，以清代乡贤林鄂《分疆录》为中心，初步总结乡绅对地方发展的贡献。

一、出资倡议，修建基础设施

各类基础设施和地方事业的发

展，需要较多人力、物力与财力，也离不开组织者和倡导者。泰顺群山绵亘、溪流众多、区位相对偏僻，交通条件落后，这方面的缺点在古代更为突出，修桥补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较其他地区有更大的必要。

横跨山涧的一道道廊桥，通达内外的一条条古道，其建造与开通往往有乡绅活跃的身影。他们有急公好义、热爱家乡的情怀，有相对雄厚的物力条件，有人丁众多的家族力量。以位于泰顺县城南部的登云桥（又名南门桥）为例，该桥始建于明代，明末清初因战乱遭到毁坏，影响乡人通行。清顺治年间，年高有德的王君祥召集工匠“起而修之”，便利人们通行。今垟心街南段横街路口至人民路，旧名担水弄，系罗阳富户董天香等开通的，为缩短人们汲水路程，董天香主动让出自家350余尺长、6尺多宽的田地，并动员近邻姻亲刘杰等

招募工匠施工。开通后，“人人称便”，这条路因而被称为“义路”，董天香、刘杰等乡绅在乡人心目中的威信也进一步提高。

山间的凉亭、阁子，具有遮风避雨、供人休息、彰显美观等功能，与周围青山绿水相互映衬，体现出人文与自然和谐一致的美感。凉亭、阁子的修建，乡绅也有积极贡献。清代，旧的万罗山亭年久失修，需要翻新，罗阳人潘浦“躬为修葺”。仕阳翁地有座山，是当地善男信女经常祈祷求雨之处。国学生林兆雷虽对这种迷信行为持怀疑态度，但担心乡邻的行路安全，顾念风雨天气人们无处躲避，于是安排村中子弟辈建造“灵胜阁”。建成后，登山者“无冒险之虑，而有憩息之所”。

科举制推行的背景下，崇文尚学的社会氛围愈加浓厚。教育文化类基础设施，乡绅支持配合力度更大。清代，建造县级科举考试场所“校士馆”时候，知县音德布主持，地方乡绅富户纷纷捐资相助，并大力发动民众出钱出力，很快“协理其成”。明代，旧学宫坍塌，县级官府决定重建，选址于凤凰山之畔，“劝富民量助”，得到踊跃响应，很快顺利完成。清代，重修泰顺学宫的时候，知县李庆云“进绅耆择能而

使”，把这一重任交给乡绅、太学生潘学地。在潘学地精心组织下，民间富户、父老乡亲积极助力，这项工作得以顺利完成，乡绅的组织力与影响力可见一斑。

二、富而好礼，完善社会保障

古代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农业是基本的经济形式。著名经济史学家黄宗智先生研究认为，明清时期到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农业长期处于糊口水平。因生产力落后、科技发展水平较低等局限，人类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也相对较弱。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有规模小、实力弱的特点，在应对灾害、饥荒时呈现出脆弱性，而乡绅则具有相对雄厚的经济基础。每有灾荒等特殊事件发生，他们往往通过各种方式对乡邻给予帮助，受到父老乡亲的交口称赞。他们有的以平价出售粮食，北宋宣和年间，泰顺一带饥荒时期，富户蔡允嘉“平糶以济乡里”，绝不趁此机会囤积居奇。有的则直接献出粮食、钱款等，不图回报。宋代，葛垟人陶仲厚在灾荒年把粮食分给乡里，并减少田租、烧掉债务凭证。他乐善好施的行为，得到官府鼓励，知县郭显宗亲自在他墓碑上题写“陶处士”3个字。清顺治年间，泰顺一带发

生连年灾荒，饿死者相互枕藉于道路，乡绅夏简在把家里的粟米拿出来开展赈济，“全活无算”。

平时，乡绅也周恤穷乏，体现仁者之风。北宋时期，泗溪人对族人、乡邻中生活贫困者给予周济，“尤厚于死丧之家”。明代，葛垞人陶瑄对生活匮乏的乡邻，贷出钱款而不收利息，而且不硬性规定借贷者偿还期限，被乡亲们称为善人，刑部侍郎刘节为他题写“明处士”3个字在墓碑上，以示表彰。清代，东隅（今属罗阳）人、廪生季启亨屡试不第，居家教导子侄以耕读为先，族人乡里有需要物质帮助的，他“周恤弗懈”，得到同乡人的一致称赞。为提高民间救济能力，地方富户还倡议成立有自发性互助性质的社仓。清朝，吴师琴在南院、下阳村等地捐建社仓，起到储藏粮食、救济贫民、维持稳定的作用。

三、组织协调，维护地方安定

交通不便的古代，维持地方安定难以做到只靠官府的军队。乡绅凭借自身具有的社会影响力，利用家族、同乡等关系，在维护地方稳定方面发挥着组织、号召作用。有时候，面对力量薄弱的小股流寇，乡绅发动民间团丁即能平定。南宋建炎年间，来自

福建一带的流寇李迎进攻泰顺一带，曾担任过武官退隐回乡的蔡允升召集乡兵，“骤入擒之”，呈送官府。

乡绅率领的乡兵是配合官府的军队作战、壮大剿寇队伍的一支重要力量。明初，流寇骚扰三魁刘宅一带，刘德邕及时把消息汇报给官府，请求支援，并被委任为前锋。他配合官府剿灭了这股流寇，“一方良民赖以安”。作战中，乡绅往往身先士卒，起到鼓舞士气、担当表率的作用。明代，叶宗留、邓茂七等暴动武装影响波及泰顺，一些土匪趁火打劫。为安定地方，泰顺夏孟品“聚义旅，保乡里”，每次作战，都身先士卒，最后，他和儿子夏文象都英勇战死，受他们精神鼓舞，乡人们作战也愈加勇敢。清康熙年间，三藩之乱爆发，耿精忠自福建起兵反清。海盗趁火打劫，在福鼎桐山登陆，向泰顺泗溪、罗阳一带进发。洪口、陶家山、龙潭口、筱村一带民众，“推副贡夏大辉为保长”，加强联防合作，“贼搜掠不敢至其地”。

乡绅主导下，人们凭团结、勇敢，使乡里免遭海盗荼毒。明朝时期，倭寇骚扰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泰顺也受到破坏，为保护家园，乡绅积极作为。嘉靖年间，倭寇自福鼎桐山

登陆，向泰顺一带进攻。泗溪人林田率领乡兵在排岭地一带守备，与敌短兵相接，因寡不敌众而牺牲。明崇祯年间，福建海盗沈可耀假装倭寇，率众数百人进入泰顺，生员林宗椿“请于县，率乡兵击之”。

四、沟通官民，发挥桥梁作用

乡绅作为官府与普通民众之间的“中间层”，发挥着桥梁纽带的作用，对缓和官民矛盾起到极大的作用，可谓是“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调节器”。他们将地方上的善行义举汇报给官府，有助于官府及时掌握情况并对其进行表彰。明万历年间，泰顺发生饥荒。官府制定奖励政策，凡是捐助粟米百石以上者，授予冠带。地方富户刘一梅有意向，“里老暨乡邑绅首以梅名闻”，汇报给官府。刘一梅欣然捐资，官府也同意授予他冠带。这件事上，乡绅协助官府提高了富户捐款捐粮的积极性。

乡绅运用在官府面前的话语权，在下情上达、减轻民间疾苦、维护民众利益方面发挥作用。例如，清初沿袭明朝旧例，在赋役之外，还有“岁例”，由里长负责催征，加重了民间负担。泰顺生员吴兆英等向道府、学院反映，没有得到回应。吴兆英远赴

省城杭州，向浙江总督朱宏祚“婉陈邑民疾苦，至于声泪俱下”，得到了朱宏祚的同情。朱宏祚在面见皇帝时，将民情上达。在朱宏祚及其后任的争取下，岁例这一弊政得以革除，减轻了民众的负担。又如，清朝拔贡董永孚对服贱役的乡人“言于官，出之”。官、绅、民三种力量格局中，乡绅扮演平衡二者的角色。

五、引领道德，助推良好乡风

整体而言，乡绅群体受教育程度较高，有道德、明事理，对周边的人有示范引领作用，有助于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这些品质如忠于国家、情钟桑梓，彰显忠义之风。清朝曾三凤、三重、三益兄弟在福建流寇沈可耀骚扰泰顺时，英勇抗击，均壮烈牺牲，“一家忠义，感激乡人”。孝老爱亲，清朝林养性“事父尽孝，左右色养”。和睦兄弟，潘孟规、孟矩兄弟“饮食必俱，出入必偶”，互帮互助，长时间不分家，直到子孙众多，房屋内容不下的时候，才分家。团结家族，明朝高大任退休之后，建造房屋分给族人，邻居、族人有物质贫乏者，“皆周恤之”。友善乡邻，构建和谐邻里同村关系，明朝陶灌家庭经济实力雄厚，有来借贷的，他从不

拒绝，“邑东诸乡赖之全活”。淡泊名利，志趣高洁，明代潘鉴担任宁王朱宸濠的典议官，知道宁王有异志之后，辞官归乡，闭门读书，“士大夫重其清操”。崇文尚学，北宋林韶创办学馆“儒蓝宅”，邀请各地有学识的士人担任教师，“使诸子若族人皆从学”，对推动整个家族、乡村文化教育的进步作出了贡献。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礼治社会，人际纠纷往往不轻易诉诸法律，而是找德高望重、明晓事理的人对事情进行评判。乡贤在调解乡邻矛盾、缓和人际关系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清代雅阳人欧朝扬学问精深、做人忠诚，乡邻们有争执不决的事往往找他调解，他语气温和，并对于双方的不对进行耐心指出，“莫不感悟以解”。梧村贡生庄翼文以孝顺父母、勤劳严谨获得了很高的威信，乡邻们有争执的事情，他都进行劝导，“罔不心服”。乡绅调解无疑降低了官府行政成本，优化了基层治理模式，同时弘扬了和睦相处、宽容礼让等道德观念。

六、结语

作为地方精英，泰顺古代的乡绅群体凭借在物质、精神等方面的优势，承担起地方建设的参与者、领导者、官民中间人等多重身份，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角。乡土社会中，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影响下，他们有较强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对公共工程修建、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地方安定维持、官民关系缓和、良好乡风打造等都能作出突出贡献，成为官府力量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裨益于地方治理体系优化。在处理日常事物过程中，乡绅以实际行动演绎出“乡绅文化”，这是一种精英文化，蕴含着立人达人、兼济天下、情系桑梓、主动担当、甘于奉献等积极成分，已逐步积淀为区域文化的组成部分。在建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观背景下，研究古代乡绅在地方发展中的重要性，对于今天优化基层治理、打好“乡贤泰商”牌、加快泰顺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借鉴参考作用。

（作者单位：泰顺中学）

编撰史料 贵在坚持

——谈编撰《泰顺县交通志》体会

◇ 林 泉

2012年，我受聘于泰顺县交通局，着力编修《泰顺县志交通篇》。后经两年多的资料征收与编辑，成书得到县志办的一致好评。自此起，我萌生了编撰1987年以后《泰顺县交通志》的决心。但要收集涉及面如此之广、时间跨度如此之长的历史资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将我编修过程中的心得体会与大家作一个分享。

编排纲目是志书编纂的要领。起初，我们以《浙江省交通志》和《温州市交通志》为参照样板，但在实际编写过程中，又发现泰顺县存在很多自身的特点，要根据本县的实际情况进行编排。如交通文化是全国的独特创举，是全省公路文化建设示范单位，因而必须将“交通文化”单列一篇叙述。就纲目编排的问题，我们多次请教县志办的专家，并在编写过程中根据实际内容逐步完善。

采集资料是志书编纂的关键。交

通系统下属单位多，为我们提供资料是他们额外的工作。刚开始也有个别单位要求提供交通局的书面文件，但编纂只是个人行为，为交通部门留存史料而作。在我以实相告后，各单位也都积极配合提供资料。因为工程建设单位的指挥部根据各项目工程而设置，工作人员都是各部门抽调，工程结束就回原单位，所以，我就不得不在每个项目工程交工验收前抓紧收集资料。这样扎实的工作，才使得全县不同时期的工程项目实施情况得到如实记录。

志书中“服务交通工作满20年以上名录”是我设立栏目添加的。我认为全系统交通人为全县交通事业的发展作了无私的奉献，应该要留下姓名。但可惜的是个别单位由于退休后的人员是属社保单位管理，再加上2000年以前的档案不齐全，因而名录还是有遗漏，特别是百丈航运部门已



文泰高速公路
洪溪特大桥

不存在，无法提供资料。

对几座古桥的首事，上部交通志都没有录入，我认为一定要找到资料进行补遗。因此，赴当地查阅宗谱档案资料，将北涧桥、三条桥等的建桥首事人物传记进行补录。清光绪六年（1880），闽福鼎县贡生陈镛为首兴建了鹏坑飞虹桥（老58省道彭溪桥），为找陈镛生平资料，我特委托福鼎市林氏宗亲会查找，无果。可功夫不负有心人，后通过百度搜索，找到民国《福鼎县志》残稿中卷二十七“义行传”中的记载：陈镛，沈青人，……。旋即赶往柳峰乡交界的福鼎市沈青村，找到保管陈氏家谱的陈邦地村长查阅《陈氏宗谱》，谱中记述了陈镛详细的生平，并将彭溪桥石刻碑文录入宗谱。这个经

历，让人喜出望外。

编撰史料，采访资料一定要详实，写作的过程也是为了检验自己的能力与水平。坚持八年如一日，将《泰顺县交通志》文稿编竣。虽然其间遭到全体家人的反对，认为编志是政府有关部门的事，年近八十的老人应享清福，何必做这种傻事，但我感到自己手头的资料充足，爱好摄影，身体力行可以为社会作点贡献，也是一种乐趣。因自己没有文凭，又不是专职的志书专业人员，只是凭着对历史文化的爱好、几十年来对交通事业的热爱情怀，再加上决心办的事无终决不收兵的个性，最终顺利完成《泰顺县交通志》文稿。

（作者系泰顺县交通局退休干部）

主编村志的六点体会

◇ 徐世槐

《文成县西坑畲族镇村志》即将出版，值此村志付之梨枣之际，作为主编既有如释重负之快，又有遗珠弃璧之忧。在此，谈几点粗浅体会，就正于大家。

一、掌握方向要明

当前，为什么要提倡写村志？首先要明确编修村志的意义，主要是基于三个需要。

一是留住根脉的需要。2016年，中国有261.7万个自然村。随着城镇化进度的加快，自然村消失也随之加快，2000年至2010年，就有近90万个村落消失，平均每天消失80到100个，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数字！就拿西坑畲族镇范围来说，2011年有90个自然村，至2020年，就只剩63个了。假若不予以及时抢救编志留存，那传统农耕文明的实物载体也将消散在茫茫历史中。为了留住自然村这条根，留住乡愁，就必须抢修村志。

二是治村安民的需要。明嘉靖《山西通志·序》称：“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清《吏治悬镜》规定，新任官吏就任，奉行二十三条中第三条，即系“览志书”。说明当时的统治者或者地方管理者对志书的重视。

三是传承文化的需要。对村民爱村爱乡事迹的记载，是乡土教育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不可或缺的素材。这些素材将激励广大群众“见贤思齐，见不贤而自省”，更加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坚定不移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

其次，明确编志的指导思想。政府编志，属于官方修志，我们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正确对待事物。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其过程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其中有胜利的喜悦，也有失败的痛苦。我们编修村志，必须正确对待前进过

程中的挫折与困难，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避免日后走弯路。

二、遴选用人要准

村志不同于县志、部门志，在遴选村志编辑人员的时候要求会更加严格。当前，农村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经商，留在村里的大都是老弱病残，即使是一些部门单位的离退休人员，大都也有年纪偏大或健康状况不佳等局限，更多的是在县城城镇给下一代带娃，或是根本不愿意干这个“爬格子”的苦差事。物色编辑，可谓是“求三姑拜四嫂”，是编修队伍组建工作中最令人头疼的事。经多方努力，我的编修队伍共挑选到7位编辑与1位资料员。8位同志中，有6位是教师（其中4位是退休教师，2位是在岗教师），1位干部，1位农民。其中3人有编志经历，1人有校史编写经历，其他4位都未曾有修志写史经验。我觉得村志编辑人员最重要的是要有以下5点：一是热情，二是健康，三是能写，四是谦虚，五是公正。

三、调查资料要实

内容翔实准确，是志书的生命所在。就像写新闻，凡涉及的人物、事件、时间、地点、原因、结果和过程

都要真实，不能夸大或缩小，更不能凭空臆想。我们多渠道收集资料，既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官方材料主要是村、乡镇、县的档案资料，市县报纸、文史资料、年鉴等书刊资料。民间材料主要来自宗谱、老干部留下来的笔记资料、百姓口头资料以及碑记、匾等文物资料。在资料征集过程中，我们要正视资料无处可找的问题。如征求干部资料不顺畅；因档案意识不强，许多村庄几乎没有档案；村干部、乡镇干部因工作疏于交接等各种原因没有留下工作记录资料；个别乡镇即使有档案室，也因没有专门人员管理，档案资料无从查找。面对资料员、编辑收集材料困难重重的状况，我们千方百计克服。例如每一个村的地域面积、耕地面积、山林面积，总户数、总人口、自然村数、人均收入，必须要写，而且要真实，但统计口径不一样，数字出入很大。如西坑畲族镇总面积有两个数字，一个是48.29平方公里，一个是47.53平方公里，相差0.76平方公里。如叶岸村总户数一个是721户，人口1334人，每户平均1.8人；一个是465户，1315人，每户平均2.8人。为什么两次调查人口相差19人，总户数相差256户？针对这个问题，县志办领导、村志编修负责人专

程到西坑畲族镇政府与镇副书记、民政员和一个原管普查的公务员，7人合作办公。经与西坑派出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分管同志讨论研究，才最后确定数据。

四、村庄特色要浓

我看过数十部志书，感到全面有余，而特色不足。外地来的游客曾对我说过，若看《文成县志》，只要记住百丈漈、刘基庙两个景点就行了。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地方特色在志书中的重要性。温州人说，若到西坑旅游，只要去看看安福寺、敖里的周定文化广场、田寮的翰墨园，尝尝长桌宴就够了。因此，这次编修村志，我决心要写出各村的特点。县志办领导特别强调，要遵照省市专家的意见，写好各村有关自然与人文的特色。我们在拟订纲目的时候，就和编辑们进行了多次讨论，除了上面说的4个村外，叶岸的平民英雄主题馆，南坑垵的五水共治，凤鸣村的畲话畲歌、畲风畲俗，梧溪的龙麒源、富相国祠、文昌阁等，都应该设专章叙述。文字形成后，还需研究如何进一步突出特色，如塘垵村原来分散的四部分内容集中在一起，突出了廉政教育基地的内容。



文成县委党史研究室（地志办）提供

五、辅导督促要勤

村志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山区村庄编辑水平普遍较低，就必须及时辅导督促。省市专家曾3次前来指导：如何编写提纲，如何组织材料，最后评审初稿。县志办也曾召开3次会议：部署编写、典型引路、编写推进。修志的10个月中，主编与每个编辑，至少交流8次以上。我和县志办的刘国平曾经3次到梧溪，与编辑富锡金共同改稿；与刘国平2次到南坑垵与干部核对材料。我先后12次到让川与资

料员叶高侯研究编写，他也2次到我老家叶岸村核对资料，每隔十天或半个月，打电话询问各村进度，了解编写困难。

六、业务修养要先

俗话说：“打铁先要自身硬。”作为村志主编，我虽是中学教师退休，但并没有专门学过修志的知识，可谓半路出家。我先后主编过《叶胜林场志》《石垟林场志》《文成县教育志》《文成县教育续志》《西坑畬族镇志》等，一共180万字，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一本一本去积累经验。2017年，瓯海、龙湾的乡镇领导经常到温州日报社请编辑修志，大部分编辑都没有写志的经验。后来，报社领导邀请我给年轻的13位编辑作了以《如何写乡镇志》的专题讲座。我以编写地方志的理论书籍为纲，结合自己写志的实践，将自己的一些心得分享给大家。2020年11月15

日，文成县志办与西坑畬族镇领导聘请我担任《西坑畬族镇村志》主编，我就邮购《中国农村发展史》《中国城市发展史》《中国古代地方志》等书籍，进行充分学习，以期在编辑业务上更进一步。

在实际工作中，体会到村志主编应是一位多面手。在编拟提纲时，他是一位设计师；在组织部署时，他是一位指挥员；在指导编写时，他是一位辅导员；在督促进度时，他是一位监督员。我兼任西坑民族村志（中心村）的主编，又是第一线的战斗员。

屈原《卜居》有云：“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上述6个方面，是我担任《西坑畬族镇村志》主编的一些粗浅体会。

（作者系《文成县西坑畬族镇村志》主编）

抗战时期温州情报战线上的 爱国壮士徐福兴

◇ 郑颀峰

缘起

2008年2月，应鹿城区委党史研究室之邀，我前去帮助工作。当时，党史研究室的同志正全力以赴开展抗日战争时期鹿城区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的调研工作，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已转入复查核实阶段。于是要求我对初步整理的材料，进行复查审阅。后编为《日军入侵鹿城暴行纪实》，这是一项全国性的《中国抗日损失课题调研成果丛书》的组成部分，层次高、要求严，责任重大，万不可粗心大意。

一天，我在查阅“口述资料”时，发现有两份写的是关于同一人徐福兴的材料，然而两份材料所反映的其政治身份则截然相反。一份口述资料表明，徐福兴是汉奸，他常与日本人有来往，但具体情节则没有提到实

质性问题；另一份口述资料则出自徐福兴女儿徐然贞，称其父亲于1944年10月间由国民党永嘉县政府委任成为地下情报员，同年腊月，日本宪兵分队队长少林邀其父去“赴宴”，自此便再无音信。家人分析，日寇已对其父下毒手，但资料中没有提及确切的人证、物证。

是日军的汉奸，还是国民政府的情报员？这是关系到一个人政治身份的大问题，在这大是大非面前，不可草率从事。在复阅材料暂告一段落后，我即着手研究和调查徐福兴的身份问题。这项调查难度较大，难就难在这本就是件十分机密的事件，要研究和确定徐福兴是否为情报员，只有国民党温州专员公署（简称温州专署）或永嘉县府经办此事的个别人员才知晓，而此事又发生于兵荒马乱之际，距今已70余年，经办的人都已先后去世。如今，唯一有望且可靠的渠

道只能是到档案馆去查看原始档案，是否还有记载保留下来。

为了查清事实真相，我特地前往温州市档案馆去查阅。然而，档案分门别类，十分庞杂，不知抗战时期的情报档案归于哪一宗，查来查去，毫无头绪。我先后两次进档案馆，均空手而归。“后续怎么办？不能半途而废，我要对历史负责。”如此想来，我决定再进档案馆。这次，在档案馆人员的帮助下，经几天仔细查阅，终于查到了有关徐福兴从事情报工作和被日寇残杀的确凿材料，也算完成了历史交托给我的一份责任，并告慰为国捐躯壮士徐福兴的终身遗愿。

徐福兴的身世

徐福兴，1902年出生于青田县半岭村一个贫寒的农民之家。一家六口靠父兄烧石炭营生。三位哥哥眼看整天劳累，举步维艰，连糊口度日也难混过去。为寻求活路，先后离家出走，与父母一别，从此音信全无。徐福兴曾于1927年随同乡漂洋过海，到日本谋生。初去，他干泥水工的粗活。不久，他看到工地旁有一牙科诊所，他便利用休息时间，趴在诊所窗台边聚精会神观看医师为就医者拔牙

等手术。他想，有艺不愁穷，学一手牙科技术也很好。医师见他如此便问他：“你是否想学口腔医术？”徐福兴点头说：“很想！”医师看他举止大方、彬彬有礼，便答应收他做学徒。正当他历经三年刻苦学习，初步掌握牙科诊治手术时，时局却突变。1930年，日本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经济衰退，社会动荡，军国主义抬头。是年12月间，两个警察突然闯进牙科诊所把徐福兴抓去，关在一座封闭的走马楼牢房，在寒冬季节令他脱光衣服，用皮鞭抽打，逼他交代“莫须有”的罪行，当他回答“没有”时，便遭一顿毒打。如此，又连续折磨多次，在他身上始终问不出名堂。后来，徐福兴找到一个机会，逃出牢房。他见日本社会动荡，若继续留在日本，恐凶多吉少，便决然回国。

1932年，徐福兴在温州市区八字桥开设牙科门诊，一干就是十三个年头。他精湛的医术，和善的态度，深受温州市民的赞许。

一位秘密情报员

翻阅档案，在1944年12月13日温州专署情报组组长黄仲汉的一份《报告》中明确记载：“同日（按即：12

月10日)午后,会着徐××(指徐福兴),详谈一切,佈就以后的新线网与交通人员,教导彼等各的联系暗号,一切任务皆达。”

《报告》言简意赅,仅41个字把应讲的事情都作了高度概括。这是日寇第三次侵占温州(1944年9月9日至1945年6月26日)中期,温州专署情报组举行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情报工作碰头会。会面时着重部署今后“一切任务皆达”“教导彼等各的联系暗号”,严守纪律、沉着应对,圆满完成后续情报任务。参加碰头会有几人,不详,只点及召集者黄仲汉自己和主要情报员徐福兴。徐福兴为温州专署情报员证据确凿。

6月30日下午4时,专署机关赵秘书面谕黄仲汉:“飭速详查徐福星(兴)外围人数姓名略历。着即具复为要。”同日下午6时,黄仲汉即谨将查得具复如下:

“徐福星——据今日所查(有)五个外围(成员):

刘子玉,永嘉人,住本城西门外,业小贩;

刘迪丰,永嘉人,住本城三港殿巷前,业小贩;

陈伯林,永嘉人,住本城瓜棚

下,业车夫;

徐李钱,永嘉人,住本城三港殿巷前,业车夫;

陈金升,永嘉人,住本城信河街,业剃头。

上述五人,此次伏城,尚无不法行为。刘迪丰,充当交通员;徐李钱,曾送二次情报到(专署)高楼;陈金升,曾送一次情报到桐溪(三十三师)指挥部;陈伯林,曾送一次情报到林垵。”

从这些资料可知:当时,徐福兴(星)并非单枪匹马,其下还有5个外围成员,曾为温州专署和驻军传递情报。

提供的重要情报

资料显示,徐福兴约于1944年9月下旬(或10月)至1945年4月期间从事秘密情报员工作,并于1944年10月至1945年1月间向温州专署和驻军提供了一批重要情报。

三十三师副官夏金祺投敌后,于1944年12月7日会见敌持田(徐福兴做翻译)。夏逆极力为敌奔波永(嘉)平(阳)间,勾引驻平阳师管部队与

自卫队向敌投降中，敌委夏逆充警察队长，他还吸收草警游勇50余人充当警察。

1944年12月9日，梧埏区关有吴钦民、林知亮、孙镇瓯等三人，同见敌持田（徐福兴做翻译）。吴逆等人自称有干部武装200余人，枪支齐全。还向敌提出投降条件：该武装成员仅限在梧埏区域活动，不调它区；弹药须由敌方接济；按月供敌若干税收等。敌答以考虞，稍缓。

1944年12月，黄逆湘帆向敌摆尾，乞求工作（徐福兴做翻译）。黄逆自称有永嘉县警察局长资格。敌人对黄逆底细还尚不清，难下定夺。既有局长资格，还得待伪县政府成立后，由它去定。于是，持田说“你先回去再讲。”詎料，该逆不知羞耻，要敌先派他做其他工作。于是，持田问徐福兴，此人究竟有何能？徐云：他是永嘉警察局的老侦探，捉贼是可以的。持田随后便派该逆到县伪总会政务警备班充侦探，后又兼经济委侦探。徐听后沉思长叹：按该逆过去作恶多端，咸城人人恨之入骨；现在为虎作伥，嗣后，城民不知有多少性命在其手中？！

1944年12月间，敌迫各伪乡镇速成立伪粮食公会，经费自筹，目的是为敌控制粮食贮存贩运销售。各伪组织不遗余力，而不顾民众死活。

1944年12月间，徐福兴报告伪组织动态：南市伪镇长调许逆玉麟、集云伪乡长调陈正为、海坛伪乡长调杨敬之、落霞伪乡长调吴江冷、梧埏伪乡长由敌派前副乡长朱某充任，十二日成立。

1944年12月22日午夜，敌便衣50余名、武装23名，窜永临区朱塗地方，将永嘉乡村电话驻在该处之总机房屋包围。内有接线生二名，勤工一名，修装老司二名，永临区署派驻的情报员二员，电话机一具，器具多件。敌随将人和机具等物併劫往温州城区。

事后，黄仲汉“自悉后，当派职儿拟带亲笔函，请托徐福兴从中设法营救人员出险，以挽救其余机司工人安心服务”。

12月24日，城敌扬言，春季发动三个攻势：（一）攻瑞平；（二）扫清楠溪，占领青田，打通青永乐线；（三）收并玉环，统一瓯江。

特急。1944年12月27日，敌寇积极筹划春季进攻，以固温州外围。已拟计划，呈准最高首首梨冈。届时分路蠢动。第一路出扰青田方山线；第二路窜扰瑞安占领马屿；第三路用海军或勾结大刀会匪，从平阳鳌江窜入内地。现正向金华商调寇兵来温。

急报。1944年12月28日，敌人最近将动员300人左右兵力，要窜藤桥劫掠公私粮食。除通知电话报告外，谨闻右呈。

伪南市副镇长杜品中，于1945年1月5日动身到大岙田管处胞兄杜阿一处活动，原因为恐其兄被累，要其与家属搬回温州等云。已通电话，将其中途截获。

1945年1月6日下午四时，徐福兴报告：城敌自1945年1月2日起，每日下午5时后，召集盘踞永嘉县城（即温州城区）大小酋在司令部开秘密会议，提出三个难题，磋商办法。

（一）城区驻军与各伪组织及住民等，人数众多，粮食最多仅能敷衍最近一、二月内，过此将闹粮乱（荒）。上河下河等乡，为富产所在，我军防范严密。新调第三团，战

斗精锐，不易护抢。

（二）储弊虽经强迫市民通用，而效果很廖，商店始终不肯正式复业，市民内心仍未投降。

（三）温州外围，看目前趋势，难以开展。

上述三点，为敌寇开会之中心议题。不料汉奸沈鹤年、朗锦云二人当场向敌人媚献温州详图一副。敌人看出抢粮路线一条（由永嘉到青田过大林后，反（翻）山抵达平阳，抢粮）。至于平阳城乡，敌早已派间谍潜伏匿活动。报请转呈等情。

爱国情怀 永留人间

1944年9月，日军第三次攻占温州，日本宪兵分队长少林到温州后不久，得知徐福兴曾到日本从医多年，又会讲一口日本话，便命他去当日军的翻译。与此同时，温州专署亦考虑到日军有长期占领温州的趋势，需要有人从事掌握敌伪的情报工作，因此设立了情报组，由黄仲汉任组长。温州专署研究分析，徐福兴是从日本归国的华侨，会讲日语，既是日寇可利用的对象，也是可动员的人选，只要加以真诚引导，相信国难当头、爱国为要，完全可以让其打入敌阵为我所

用。且他在城区从业牙科10多年，待人和气、善操职守，民众赞誉良多，又岁及不惑，年富力强，有较成熟的社会经验。因此，温州专署决定聘徐福兴为情报员，并派员与其面谈。

据徐福兴女儿徐然贞在“口述资料”中回忆：“1944年10月间，正当父亲为避难带领全家回故乡青田时，永嘉县府（实为专署情报组）派人来到我家，动员我父亲不要回青田，要留温州担任（专署）情报员。”自1944年9月底至1945年1月初的100多天中，徐福兴早出晚归，明做日本翻译，暗为温州专署和温州驻军提供敌伪的重要情报，为温州人民抗击日军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5年1月初，徐福兴与家人失去了联系。正如其女儿在“口述资料”说：“1944年深冬腊月，敌宪兵分队长少林说患牙病，邀我父为其治病。几天后，又说牙病给治好了，请我父“赴宴”。从此父亲杳无音信。家人分析，日寇已下毒手。”另据温州市档案馆珍藏的相关敌伪情报档案中有关徐福兴的活动情况记录亦表明，自1945年1月7日至4月17日的100天中，没有显露徐福兴的活动踪迹。从时间节点来看，其女儿说的是1944年“深冬腊月”；徐福兴向专署情报组长黄

仲汉报告最后一份情报的时间是1945年1月6日下午四时，两处反映的时间节点基本相符。敌少林约在1月6日前后，借邀徐福兴“赴宴”之名，行秘密将徐福兴押往乐清柳市关押于敌地下牢房之实。

徐福兴被关在柳市敌牢房后，曾发生徐福兴越狱被抓回遭到残暴毒打的事件。徐福兴女儿在“口述资料”的一则内容中，提供了这一十分重要的信息。她说，在敌少林邀其父赴宴就杳无音信，后隔了好久，有一位四五十岁的男人来到她家说起父亲的事。他说：“我与徐先生都是关在柳市的。一天中午徐先生吃上了一块肉，按日寇惯例，吃了肉很快就会被杀害。他已意识到过不了几天，日军就要杀害他。那天晚饭后他去厕所之便，越墙逃了出去。腿却跌断了，无法行走，忍着疼痛爬到附近一座屋里，住户即去宪兵队报告，随后来了两个日本兵，要把徐先生押回去。徐先生强忍断脚疼痛鼓起勇气倾全身之力扑向敌人，与之搏斗。后来又来个日本兵，才把徐先生押回去。敌人即用辣椒水灌，用皮鞭抽，用竹签扎十指，疼得徐先生多次晕过去。残暴的敌人边打边问他招不招？徐先生真勇敢，严刑毒打都没有招供。敌人还

将他抬起摔在石阶上，徐先生奄奄一息，被抛进了地下牢房。后来徐先生托我出去后一定要到他家告诉家人不要悲伤，要好好地教育孩子们，长大成人国出力！’说完，那人便离去。至于他是谁，她也一直不知道。

惨遭日寇残杀

黄仲汉于民国34年（1945）四月廿五的《报告》中记录了日寇残杀徐福兴的经过：“本月18日上午九时许，驻永嘉宪首少林分队长奉乐最高酋首梨冈密令，派宪寇二名，传徐福兴谈话。徐当偕同宪寇到队部。时约十时零，该少林唤徐至后面天井中，

立向徐击两枪，徐倒地毙命。当时敌即加以消骨药水，须臾间，徐尸化为乌有。”

当我们把调查徐福兴所得的情况告诉其女儿徐然贞时，她顿时悲喜交集，热泪盈眶，压在心头的千斤巨石终于放下来了。

爱国主义是每一位中华儿女对国家和民族最崇高的思想品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穷凶极恶的日寇面前，徐福兴始终坚贞不屈、横眉冷对、视死如归，其爱国主义情怀，将永留人间！

（作者系温州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员）

老骥伏枥 誉满杏坛

——记温州教育界老前辈李方华

◇ 李岳松

李方华（1927—2019），温州乐清人。中国新闻专科学校、中央教育行政学院毕业。1947年7月参加浙南游击纵队括苍支队，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括苍中心县委青训班负责人、中共乐清县委书记、宣传科长，温州瓯海中学（四中）、温州中学校长、书记，温州市教育局局长、温州市人民政府教卫体办副主任，中共温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温州师范学院党委书记。离休后主编《温州市教育志》《温州市学校概况》等书130余万字，并积极从事社会公益活动。2017年，获“最美温州人”感动温州十大人物荣誉称号。

初识这位被誉为温州教育“活字典”的原温师院党委书记李方华，是在十几年前温州中共党史学会召开的学术委员会全体委员会上。那时，他虽已是耄耋之年，戴着眼镜，身材瘦

小，但身上却散发出浓浓的知识分子的气质和年轻人的活力：海南潜泳、攀登阿尔卑斯山、周游世界数十国、编邮集、修志书、建史馆、办活动、做公益等，身兼社会数职，李老师的工作热忱与干劲不减当年。

开展向李方华同志学习活动

2019年5月14日，温州市老干部局、温州市离退休干部工委向全市各县（市、区）委组织部（老干部



2018年3月5日，李方华获评“最美温州人：2017感动温州十大人物”

局)、市直各单位发出通知,开展向李方华同志学习活动。

通知指出,李方华同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许党报国,老有所为,无私奉献,是离退休干部党员中涌现出来的杰出代表。2017年,李方华获得“最美温州人”感动温州十大人物荣誉称号,当时评委会给予的致辞是“不忘初心,立德立言”。这短短八个字即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青年时期,向往革命,岁月峥嵘;大半生涯,献身教育,桃李天下;离而不休,热心公益,不忘初心。通知要求,要学习李方华同志牢记宗旨、以身作则永葆党员本色;要学习李方华同志老骥伏枥、锐意进取的精神面貌;要学习李方华同志余热生辉、奉献不止的价值追求;要学习李方华同志慷慨慈善、有所作为的大爱精神。

峥嵘岁月 投笔从戎

1944年,乐清沦陷,日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日军的暴行给李方华幼小的心灵留下了伤痕。那年,他还在读高中,因穿着的学生军训服颜色很像国民党的军服,日军以为他是国民党的士兵,就用枪顶着他的头盘

问,后来看他那么瘦小,不太像国民党兵,狠狠地打了他一巴掌,将他推倒在地上。那时,他就暗下决心一定要投笔从戎、保家卫国。当时,他家是游击队的一个秘密交通点,哥哥是一名共产党员,受家庭和哥哥的影响,他走上了革命道路。

后来,李方华考入了设在上海的中国新闻专科学校本科班(后并入复旦大学)。在大学学习期间,他和进步同学参加上海高校爱国学生运动,参加公祭李公朴、闻一多先生大会和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大会,聆听周恩来同志亲自到场的演讲,进一步激发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坚定了投身革命的决心和信心。



20世纪90年代,李方华重返张溪、郑山等革命老区村留影

1947年，年仅20岁的李方华走出大学校门，加入活动于乐清、永嘉、仙居、玉环、黄岩等地的浙南游击纵队括苍支队，参加了括苍中心县委举办的革命知识青年训练班的学习。由于多数队员文化程度低，李方华就教他们读书识字，学习革命理论，传授进步思想，同时也向他们学习射击、投手榴弹等技术。

青训班结业后，李方华被分配到楠溪中心区委，在永嘉和仙居交界的岩坦、黄南、张溪一带穷乡僻壤的山区做地区党务工作，跟随武工队开辟新区、巩固老根据地。这里山高岭峻，环境恶劣，生活极其艰苦。革命工作常常离不开爬山岭、住山洞、挨饿受冻、遭敌围追堵截。1949年5月以前，在括苍中心县委的领导下，李方华冒着随时会被国民反动派“围剿”的危险，在极其艰苦的游击环境中，举办四期青训班，为部队和地方培训输送了各类干部400多人，提高地方干部的文化素质。

和平年代 长期从教

新中国成立后，李方华一直在温州从事教育工作，先后担任过瓯海中学（现温州四中）校长、温州中学校



1984年4月23日，李方华（后排右五）参加乐清（南充）党史工作座谈会留影

长、温州市教育局局长、市教卫体办公室主任，1983年任温州师范学院党委书记，一直到离休。

在调到温师院之初，因学院刚刚起步，条件非常差，工作艰苦，师资缺乏，高级职称教师更缺。他和校长设法到处招调教师，在评职称时也不片面强调学历，只要有真才实学，又有较高教学水平的人才就破格提任，使他们成为学科带头人。

由于受“文化大革命”影响，许多知识青年失去上大学的机会，过早地走上社会，一直未圆大学梦。为此，温师院中文系办起了夜大学，李方华给予大力支持，为这些白天要上班、还要照顾家庭的特殊学生提供一个上“夜大学”学习的机会。起初，浙江省教育厅不承认这个夜大学。李方华就去教育厅争取，告诉厅长这些学生学习很勤奋，



1987年9月16日，全国政协副主席苏步青到温州中学探望其母校师生时，温州中学原校长、温师院党委书记李方华热情迎接苏步青

成绩也不差，应该对他们鼓励才对。最后，教育厅承认了这个夜大学。事实证明，他们中不少人后来都成为所在单位的骨干和领导。

温师院作为浙南地区唯一一所师范类高等院校，承担着浙南地区教育事业发展的艰巨任务，作为院党委书记的李方华深知自己责任重大。为了扩大校舍、招聘教师，他和校长多次走访省厅领导及外地高校，请浙江大学、杭州大学的教授作为温师院的客座教授，并顺利完成学院路新师院的征地审批。

李方华在群众心目中是位好领导。任瓯海中学（今温四中）校长时，他组织员工烧热水、灭臭虫、除跳蚤，标记游泳安全区，下水测定平整深浅。任市教育局局长时，他对

同志不论职位、年龄，皆称朋友，离任后仍坚持聚会叙旧，取名“南山会”，为每位同志撰写寿联编印成册，名曰“南山集”，坚持相聚30年。任温州中学书记、校长时，他任劳任怨、吃苦在先，为师生排忧解难亲如兄弟，其言行更像父辈。从教四十余载，深耕细作显清廉。

退而不休 余热不减

李方华是一位7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离休后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但“离休不离党”，他的心思就从未离开过温州的教育事业。从60岁离休到92岁，他连任温州大学（温州师范学院）离退休党总支书记32年。李老师是市老干部“红色网宣队”活跃者，他88岁学会使用网络技术，建起10多个微信群，坚持每天宣传不歇，通过这10多个微信群，向党支部书记、党员和离休干部传播正能量信息，并撰写网评文章，批评网上负面现象。

李方华阅读广泛，从12种报刊中先后剪辑资料100多种，自费带领大家学习、参观、发奖、互勉。他先后主编了百余万字《温州教育志》、编写了《温州市学校概况》、主持创建温州市教育史馆、撰写《百年老校温



2012年9月28日，温州教育史馆开馆，李方华老师接受采访

州中学校史的特色》及温州教育古代与近代史资料，兼任温州大学校史馆的顾问，参与筹办温州大学、温州中学等多所学校校庆，被誉为温州教育“活字典”。他还参加温州中共党史学会，参与编审有关温州党史刊物、纪念文集，帮助老战友出版回忆录。长期资助贫困群众与学生，2017年10月，为了抢救急症的李萍同学，他带病去银行取现捐献；拿出“第六届温州大学华峰品德奖”奖金和自己的部

分积蓄，共计2.8万元，资助温大1名困难员工和6名特困大学生。

李方华爱好集邮，曾获全国、省、市集邮先进个人荣誉称号。晚年选编了《伟人毛泽东》《恩来百年》等20余部邮集，亲自送至中小学、城乡山区展出。牵头组织海内外旅游数十次，为大家选景拍照，冲洗几百张照片无偿奉送，暖人心田。他曾18次荣获优秀老干部、优秀党员的称号，是共产党员的先进楷模、优秀先贤，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中被评为“最美老干部”。

青年时期，李方华投笔从戎，出生入死；新中国建立后，从事教育事业，鞠躬尽瘁。在其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幅学校赠送的匾额，上书“誉美杏坛”。这四个字正是李方华一生真实的写照。

（作者系鹿城区委党史研究室退休干部）

四十年后再回望

——《金乡奇闻》发表的前因后果

◇ 吴东峰

我们的问题常常出在对私营企业或民营企业的怀疑和不信任上，总有一种思潮，视私营企业或民营资本为洪水猛兽。

——摘自《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

四十年前的一天，当时才入行记者两年的我，因为一个偶然的机遇，随时任新华社南京军区记者站站长顾国璞、温州军分区宣传科长葛林宥一起来到金乡采访，写下了一篇约400字的小文章，题目就叫《金乡奇闻》。

四十年后的今天，也是一个偶然的机遇，我认识了曾为温州媒体同行的林勇先生，他与我谈到小时候阅读《金乡奇闻》的印象，甚至还收藏了一本当时发表此文的《瞭望》杂志，令我十分感动，同时也撩动了我再访金乡的兴致。

—

这是一趟穿越时空的旅行，遗憾的是，与我同写此文的顾国璞、葛林宥前辈早已作古、当年接受我们采访的对象，如民间书家唐怀清、信用社主任陈礼钊、区长曾云超、个体户夏家波等有的已经去世，有的不知所踪，有的已年迈无识。只有镇委书记黄德余还能联系上，但这位前金乡镇委书记早已在“江湖”退隐，现与儿孙安度晚年了。

位于浙江温州沿海地区的金乡镇是一个依山傍水、风光绮丽的普通小镇，曾经属平阳县，现在属苍南县，在历史上属于著名的金乡卫。明朝戚继光抗倭时与当时的天津卫、威海卫齐名于国朝，威仪于海疆。望见戚继光骑着战马伫立在高大城墙下的雕塑的时候，我就知道，金乡到了！采访金乡奇闻故事的久远记忆，在我的眼前豁然都活了起

来。今日的金乡与四十年前的相比，确实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处处是新景，处处是奇闻。

1981年春，笔者第一次走进金乡老街时，立即被满街“叮叮当当”的敲打声吸引。那时他们“叮叮当当”是为了填饱肚皮干的“私活”。我记得这条老街家家户户门口都是露天作坊，人人都在挥动大铁锤，敲打着“铁疙瘩”（车床）上的徽章模片。夏家波是我采访的一家徽章作坊，他们的两个孩子天天在门口敲打徽章模子，打一个，赚一分钱，一天可以用大锤打三百多个徽章模子，能赚到四五元钱。

而如今这条街已经再也听不到“叮叮当当”的敲打声了，私营企业的徽章、标牌、票证等门面依然还在，但大多都已经改用电脑设计，机器制作，流水作业，批量生产的劳动方式。还是在夏家波两个孩子敲打“铁疙瘩”的位置，我走进了一家“打孔”的门店，年轻的店主正坐在电脑前轻松地操作着全自动打孔机，我好奇地问他一天能打多少个孔，他自豪地说，一刻不息八小时，可以打三万多个。不仅仅是打孔这一项，其他的模子制作也都被电脑取代了。这对四十年前小作坊生产者来说，是无

法想象的奇闻！

苍南县金乡徽章厂有限公司的展览大厅里，我惊喜地见到了生产徽章的原始“车床”，这个锈迹斑斑的“铁疙瘩”静静地蹲在展厅的角落里，谁也不会多看它一眼，昔日的热闹和辉煌好像与它毫无关系。

在这个被称为“徽章联合国”的展览大厅内，最早从事徽章生产行业，并被称为“徽章大王”的复员军人陈加枢的创业史吸引了无数人的眼球。看到琳琅满目、金光闪闪的各种徽章，想到他真的把生意做到了联合国的所有成员国。其中，有江泽民访美纪念章，亚运会、世界杯足球赛纪念章，中国驻港澳部队、美国、英国、俄罗斯及联合国维和部队服饰徽章等等。陈家枢的创业史，是金乡奇闻的过去，也是金乡奇闻的现在，更是金乡奇闻的未来，是令人匪夷所思而又脑洞大开的私营经济发展的奇迹。

1986年底，金乡镇有家庭工厂2931家，即总户数的70%办起了家庭工厂。现在比较有名的金乡企业主，绝大多数是当时家庭工业的主人。

1987年，金乡镇成为第一个产值超亿元的镇，也是浙江首批工业卫星镇、温州市文明镇。

1990年，金乡镇企业和家庭工业

产值达11147万元。

1993年以后，金乡镇连续被评为温州市综合经济实力三十强镇，并被列为温州市现代化示范试点镇、浙江省级中心镇和面向21世纪的中国名牌包装制作营销中心。

在互联网出现之后，金乡镇又第一个建起了乡镇网站，在网上发布企业信息辅助生产与经营，有“中国数字第一镇”之称号。

二

近期，金乡镇卫城文化客厅邀我到访并作演讲。没有想到演讲的地点，既不是文化馆，也不是大礼堂，而是在一处曲径通幽的明清古宅里。这座曾经的“沈泰丰”大商号，如今成了当地颇具盛名又别具一格的文化活动空间，其中有“风”“雅”“颂”阅读室，“赋”“比”“兴”汇文堂，还有“汉书”思想空间等。在演讲的过程中，主持人特意穿插了《改革开放之初的金乡印象》的题目，请几位与四十年前《金乡奇闻》报道的相关人员来座谈。

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回忆和讨论了《金乡奇闻》的发表情况和影响，及对私营企业发展作用等问题。他们都认为，《金乡奇闻》以

小、细、活的文本，为后人留下了真实的而非虚假的，原始的而非加工的改革开放初期的原生态记录，具有重要的文史价值。同时，它突破了当时宣传的禁区，吸引了全国媒体的围观和采访，对温州地区乃至全国私营企业的发展都产生积极的影响和作用。

历史大潮浩浩汤汤，奔流不回。那时，勇敢又聪明的金乡人敏锐地抓住了历史机遇，把私营企业蓬蓬勃勃发展起来了。《金乡奇闻》真实记录了历史，但也留下了一些疑问。在研讨会中，有年青听众提出，《金乡奇闻》中写的都是当时的金乡人在创办私营企业时很普通的小事，为什么要冠以“奇闻”的头衔？

当下的年轻人，确实无法想象和理解四十年前的社会生态，特别是文革刚结束时整个社会思想僵化的情况。可以说，当时“生在街巷里，长在民宅中”的私营企业，是在“姓资姓社”的强烈质疑声和反对声中偷偷摸摸、时快时慢地发展起来的。为此，我作了对《金乡奇闻》写作和发表过程中的补充说明，其内容如下：

（一）最早听说金乡奇闻的故事，实际上是到金乡采访之前。时任平阳县委书记张维森到南京宴请我和同在南京军区机关工作的陈如奏。就

是这一天，我们像听天方夜谭一样听张维森的秘书潘长生讲金乡人富得流油的故事，印象最深的是金乡人全镇都在做徽章生意，并把徽章生意做到了全国各地。还有买卖东西不是用手点钱，而是用尺子量、用秤秤。

（二）《金乡奇闻》第一作者顾国璞，政治敏锐、思想解放，是改革开放的热情宣传者。记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下部队采访，同时宣传全会精神，可以滔滔不绝地讲三四个小时。当他听说金乡奇闻的故事时，立即意识到它的新闻价值，带领我们前往金乡采访。那时的老一辈记者忧国忧民、立足本职、心怀天下，写的都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在基层也有“无冕之王”的地位。

（三）在由龙港前往金乡的船上，顾国璞就拿出采访本随时随地，向乘船的旅客采访。当时船上的旅客也对金乡奇闻议论纷纭，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有的说，工人不上班了，农民不种地了，是搞社会主义吗？有的说，老百姓有饭吃了，富起来了，有什么不好的？记得当时一位干部模样的旅客指着河边荒芜的田地气愤地说：“现在农民都不种田了，都去金乡卖徽章了。这怎么得了呀！”我看到顾国璞听了这话，沉默

了好久。他在船上还自言自语：“工人不上班，农民不种田了，都去做生意了。这样的情况也不好吧？”听到这里，我当时觉得这篇稿子可能会写不成了。

（四）4月25日晚，我们采访了金乡的干部，第二天在金乡镇采访了一整天，看到金乡镇以徽章为主体的私营企业热火朝天的情景，我们大受震撼。顾国璞站长的态度变化更大，《金乡奇闻》的内容就是我们这几天采访的真实记录。

（五）由于顾国璞曾在温州军分区工作，与当地干部有着很深的交情，因此写这篇文章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他曾为此稿与当地有关干部争得面红耳赤。在温州采访期间，他与温州市的许多军地干部交流过，那时对金乡奇闻的故事，反对者远远多于支持者。

（六）此稿从写作到发稿，也是一波三折，很不顺利。4月29日，顾国璞提出了《金乡奇闻》的写稿思路，嘱我起草个初稿，我约写了一个多星期，将初稿誊抄好交顾国璞。顾改稿别具一格：我读他听，边听边口述修改意见，我只要把他的意见及时记录下来，插进稿中便可。我们写了新华社的大通稿，但一个字也发不出，因

为编辑部认为此主题太敏感。于是，我们又将此稿转发《瞭望》杂志和对外部，结果《瞭望》对原稿删了三分之一，谨慎编发了；新华社对外部对此稿则很重视，全文加照片在《中国日报》（英文版）上用了一个整版。尽管编辑部对《金乡奇闻》一稿进行了删节、改动，但发表后仍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报刊进行了转载。

三

金乡出奇闻，更出奇人。金乡镇党委书记，后来的温州市委常委、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黄德余就是其中一人。所谓“奇”，就是与众不同，勇立潮头。黄德余自金乡起步政坛，以后的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据温州老报人胡方松介绍，他除了在金乡鼓励和发展私营企业外，还建起了全国农村的第一个小商品基地，创造了全国最早的非农经济的双层经营，推动了全国镇级信用社的浮动利率的金融改革，催生了新中国第一个私人钱庄的诞生。他可以说是温州私营经济发展中最早吃“螃蟹”的人。

我们在金乡采访时，黄德余请我们吃了一餐饭。印象最深的是黄德余讲的一席话，我们听了很是震动和启

发，也成了我们写作《金乡奇闻》的主要指导思想。他说自己刚任镇委书记时，镇里就业十分困难，群众没有工作，都到他家里来闹着要饭吃，后来私营企业发展了，镇里人人都有工作了，他们又都争着来拉他到他们家里去吃饭。

黄德余感慨地说：“如果全镇人都穷，只我当书记的一个人富，我这个镇委书记就干不下去了，可如果全镇人生活都超过我，还愁我这个镇委书记没有饭吃吗？我们干革命的目的，还不是为了让老百姓都富裕起来！哪有共产党人怕老百姓富起来的道理呢？”黄德余说这句话的时间是1981年4月25日。

4年后即1985年8月，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同志作了一次谈话，明确表态了支持农村包产到户政策，但对发展私营企业还在考虑之中。蓦然回首四十年，望天地之悠悠，潮起又潮落。而40年前，一位小小的镇委书记，在“姓资姓社”气势汹汹的质疑声下，就敢于表态并以实际行动支持和帮助私营经济的发展，这在当时难道不也是“金乡奇闻”吗？

（作者系著名军旅作家、广州市文联专职副主席）

国难求学路 温州赶陪都

——兼述国立中央大学沿革与战时的概况及其他

◇ 许岳林

“抗战时期，我从温州到陪都重庆的求学之路走了50天。”这是我表兄李启铃的亲身经历，也同样是当时众多学子求学之路的缩影。

自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京津地区和东南沿海的大多数高校为避免日军侵害均西迁重庆与成都、昆明一带，各自行动。其中，李启铃就读的国立中央大学（以下简称中大）的应变计划及时而全面，且成果惊人。

听完李启铃口述，我收集其同学录、照片及其他零星文字记录，咨询相关人士，查阅相关史料等，经多方核实、考证，形成如下文字，以记录那段历史。

说不尽的一路坎坷

1944年，18岁的李启铃从温高毕业，要择校升学了。当时，浙江省

有三所大学：被称为民国五大名校之一的国立浙江大学，因杭州沦陷，内迁到贵州省遵义、湄潭，只在龙泉县山沟里设分校；美国基督教教会创办的之江大学，化整为零迁到上海、邵武、贵阳、重庆等地；国立英士大学的校址，一再搬迁，到松阳白龙圳、丽水三岩寺、云和梅垄、泰顺百丈口，最后分散到温州天宁寺（今118医院院址）。与浙江相邻的江西、福建的各大院校也都在时时应变流亡。李启铃像无树可栖的鸟，无处投靠。

于是，搬迁在陪都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成为李启铃与1/3的同班同学唯一且最佳的选择。结伴同行的有吴家祥、李松林二人。此前，已有三四批同学去重庆，总共十三四人。

当时，日军到处侵占和轰炸，使得水陆交通中断、阻塞、瘫痪、失修，且交通工具落后，致使温州到重庆的路径曲折迂回而迟滞耽误，这是

今人无法想象的。

李启铃的父亲李达夫1901年毕业于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攻读数理、格致（理化），是温州地区最早进京求学的佼佼者。先后在天津、济南、厦门等地院校任教，桃李满天下。李达夫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授课期间，许广平、邓颖超皆是他的学生。1931年，李达夫回温州定居后，在温中、联中教高中理化。战时各中学搬迁乡下，薪水无几。李达夫倾其积蓄给李启铃法币2000元作盘缠，相当于教授半年多的工资待遇，或中级职员14个月的工资。以李达夫估计，这笔钱款用到重庆是绰绰有余的。然而，战时币值不断下跌，面值5元的钞票在市场已不受欢迎了。李启铃随身携带一大包妇女用的发夹，准备沿途赚点零用钱。

1944年6月1日，天蒙蒙亮，李启铃和两个同学就离家赶到西郊太史码道，在潮平时刻乘坐梭船（蚱蜢船儿），由小火轮拖驳到青田温溪，在船舱过夜。

瓯江中、上游滩陡流急。次日一早，梭船的船工下水，二人扛着船头，还有二人分别站在船舷撑篙和绕坎蹚水拉纤绳，溯江而上。不像俄国画家列宾笔下的《伏尔加河纤夫》那

样只走河岸，没有船工涉水拉纤。船经青田鹤城、船寮、海口、到丽水。日行夜息，已4天。

当时，全国各地汽油奇缺，西北玉门油矿“一滴石油一滴血”。20世纪30年代初，机械工程师汤仲明用木炭代替汽油，发明木炭汽车。在汽车尾部安装一个大铁筒的发生器和鼓风机，每次装用硬木炭100市斤，可以行车4小时，最高时速25英里（40公里）。汽车启动前，必需提前30分钟生火，手摇鼓风机助燃，等到气缸里的一氧化碳充足时，才可点火启动发动机。这种木炭汽车一直沿用至20世纪80年代。

三人在丽水搭乘木炭汽车，在崇山峻岭和坑坑洼洼间蜿蜒曲折颠簸前行。道路狭隘，下面是悬崖峭壁，两车交会都要尽量靠边，勉强通过。遇到略有坡度时，乘客都必须下车以减轻负载。副司机也下车步步相随用三角木顶住车轮，防止汽车倒退。有些地段，还要乘客们同心协力喊着“一、二、三！”的口号，鼓足力气推汽车。由于车少乘客多，汽车没有运行的时间表，人挤满了就开车。乘客或坐或蹲，被铺盖箱包挤压得无法侧身。机器不时出故障抛了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个个叫苦连天。一路

跌跌撞撞，经云和，于6月9日到达西南部龙泉县境。翌日继续乘车西行，跨过福建省界，到浦城县南下，经南平建阳，西行到邵武，三个县境行程3天半。虽然劳累，还算顺境。

之后，跨过江西省界，翻山越岭继续南下，经黎川、南丰等10个丘陵地带的县境，行程20多天。在赣县、信丰一带，日机频繁的空袭，汽车只得时走时歇。所到之处，断垣残壁，满目疮痍。随处可见三三五五面有菜色肩担破烂的难民、拄拐杖的伤兵以及无家可归的儿童。到了落脚点没有旅店客栈，就得找个路亭小庙宿夜，彼时天气热、蚊蚋多，随风吹来的是一阵阵死尸的臭气。

7月上旬，到达龙南、全南两个县境时，李启铃的钞票已经寥寥无几。沿途出售的发夹几乎半卖半送，所得甚微。而通货膨胀是战前的数十倍。可天无绝人之路。在全南路上，李启铃遇到了在当地经商的温州朔门李家村的陈先生。陈先生古道热肠，慷慨相助，借给他法币2000元。假使没有陈先生的救援，李启铃前不能到重庆，后不能回温州。兵荒马乱的年头，势必走投无路，流落异乡。

7月12日，在全南继续乘木炭汽车，跨广东省界，经连平、翁源县境

到达韶关曲江县改乘铲煤燃烧为动力的火车，跨湖南省界，北上，经郴州、耒阳到衡阳；南下，横贯湘西南，由道县，跨广西省界到达桂林。

此阶段，正是中日双方在桂林、柳州一带激战后不久。到处烽火连天，到处是战场。目之所及是成排的被烧焦的铁道枕木和炸毁的钢轨。有的火车头挂着两三节车厢倒在路旁。站台挤满难民，人声嘈杂，哭的哭，叫的叫。车票难求，黄牛乘机高价倒卖。没票的人不管死活，双手硬抓着车厢外壳的边沿，下面悬空的两只脚尖在探寻立足点。有人爬到车顶找个可坐可蹲之处，谁也没想到突然迎面而来的桥梁会撞到脑袋。车厢里无法洗脸，没有水喝，无法上厕所。到站时，拥挤的车门根本下不去，只好跟着别人从车窗往下跳。

李启铃在途中因发烧、咳嗽病重，与吴家祥、李松林分手，投奔在桂林铁路局供职的舅父，准备在其家休息几天。局势紧张，舅父正为调职在搬家，当即买来一张站票和给他治病的新药“消治龙”（磺胺噻唑），让他赶快到重庆。

李启铃身靠车厢的内壁，火车向西，北上，跨贵州省界，在黔东南盘桓两昼夜，终于抵达重庆，他便在小

龙坎车站下车。这时已是7月20日（农历六月初一）晚上八时光景，正是：暮霭沉沉楚天阔。

奔波了整整50天，再加重病初愈，李启铃实在困顿不堪，找到小客栈入住。满铺的臭虫，盖上一块大布，一躺下来，刹那迷糊，便不觉痛痒。次日下午，李启铃遇到了吴家祥、李松林，他俩是早一天到达的，亦是面容憔悴。

假若没有日本侵华，在彼时正常情况下，温州到重庆的路径是在朔门招商局码头乘海轮（“大华号”或“穿山号”）到上海十六铺码头，一昼夜。由上海乘长江轮，经南京、芜湖、武汉到宜昌，两昼一夜。非枯水期，从宜昌，穿三峡，到重庆朝天门码头，需四昼夜。全程约一星期多。满打满算九天时间已经足够了。后来打听到，来自广东怀集的同学到重庆走了约一个月；来自山西长治的同学走了20多天。尽管早已知道中大的生活条件极其艰苦，“一万人报考只录取一千名”，仍有莘莘学子不远万里而来。

李启铃到达重庆正赶上国立中央大学招生报名。

1944年7月24日，星期一。李启铃跑到沙坪坝中大本部招生处，人如潮



国立中央大学校门

涌。他报考航空系。吴家祥报考冶金系，李松林后来到北碚区读复旦大学新闻系。经过体格检查，五天后放榜，李启铃被录取在土木系学习。杰出的爱国实业家卢作孚的次子卢国纪也同期录取土木系，成为李启铃的同班同学。他们的一年级在柏溪分校，二年级在沙坪坝本部。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1946年暑期，李启铃跟随中大迁回南京四牌楼原校址读三年级和四年级。这是后话。

前人盛德育后人

国立中央大学的历史甚久。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向清廷呈请：在两江总督署江宁（即南京）创办一所师范学堂。同年，三江师范学堂开始筹建，设理化科、农学博物科、历史与地科及手工图画科，开启南京现代

意义的高等学府之先河。

1905年，三江师范学堂易名两江师范学堂。李瑞清出任监督（校长）提出以“嚼得菜根，做得大事”为校训，大力提倡科学、国学和艺术教育，首创艺术系科，为中国培养了第一代近代化的美术师资和艺术人才。

1914年，改名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同年，南高师设立体育科，为中国高等体育教育的开端，开创了中国现代体育事业。

1918年，中国科学社设在南高师。南高师成为中国现代自然科学的发源地。

1923年，南高师正式并入设置5科28系、学科之齐全居全国大学之首的国立东南大学。

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以国立东南大学为基础，并入由原东南大学的工科机械、土木、电机等3个系在内的河海工科大学、上海商科大学和江苏法政大学、江苏医科大学及江苏省四所专门学校，改名第四中山大学。

1928年定名国立中央大学，简称中大。校址在南京四牌楼，占地面积5800余亩。

1929年，中大共设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8个学院，是当

时全国高校中门类齐全、院系众多、规模最大的大学。教职工员共计346人，其中教授、副教授109人，讲师89人，助教56人。

1930年10月至1932年8月，不到两年内，先后有朱家骅、任鸿隽、桂崇基、刘光华、段锡朋、李四光等人被任命中大校长、代校长。他们彼此间虽有意见不合，然在职期间均能任劳任怨，恪尽职守。直至1932年8月26日罗家伦被任命为校长，易长风波遂告平息。

迁址重庆

罗家伦（1897—1969），浙江绍兴柯桥人。他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父罗传珍，曾任江西进贤县知县，思想进步，家伦幼年就受其父影响。早年求学于复旦公学，1914年进北京大学文科，是蔡元培的学生。1919年，在陈独秀、胡适支持下，与傅斯年、徐彦之创办《新潮》月刊，积极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同年，当选为北京学生界代表，在《每周评论》上第一次提出“五四运动”这个名词，一直沿用至今。

1920年秋，罗家伦赴美、英、

德、法等国名校留学。1926年回国参加北伐。之后，任教于国立东南大学历史系。1928年，出任国立清华大学首任校长。任上治校有方，颇见成效。1932年8月起，罗家伦任中大校长，长达10年之久。他到任之初，即提出“安定、充实、发展”六字方针与“诚、朴、雄、伟”四字学风。延聘名师充实师资，调整扩充学科设置，努力改善办学条件等。

1934年，罗家伦决定建设“万人大学”，另辟新址，初步选定中华门外的石子岗一带为中大新校址。1935年，内务部颁布公告，征得土地8000亩。由教育部出面，聘请叶楚伦等9人成立新校舍建筑委员会，预计1938年秋建工落成。但新校址动工半年后，便爆发卢沟桥事变。1937年8月，日军攻占了上海。逼近首都南京，中大决定西迁。罗家伦留下他的期望：“抗战胜利后，每个爱护中大的人，一定要把它（建设“万人大学”）实现的！”

对于日本侵略者的狼子野心和残暴行径，罗家伦早有预见与准备。当1935年华北局势紧张之际，他就吩咐事务处赶制900口大木箱。七七事变后，罗家伦紧促组织迁校准备工作，动员全校师生分工负责，装箱打

包，将图书、仪器、教具、以及航空教学用的拆卸好的3架飞机、医学解剖用的24具泡制尸体等一一装箱。对于学校迁移到重庆，罗家伦力主一步到位，确保师生安全和教学顺利。他在教授会议上提出三点理由：抗战是长期的，不便一搬再搬；以水路直达为宜，无需辗转；重庆山陵起伏，宜于防空。罗家伦的远见卓识使得学校避免了数次搬迁之苦，也让学校成为抗战过程中因搬迁损失最少的一所大学。

1937年9月23日，教育部“准迁重庆”批复下达，学校教职工和学生于10月上旬开始迁移，最后一批学生于11月中旬到达重庆。搬迁总体进展顺利，但也遇到了一些小麻烦。当时，已运到南京下关码头的图书仪器，因长江航运的船只极为紧缺，正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幸得民生实业公司总经理卢作孚鼎力相助，并免费提供服务。

最让罗家伦伤脑筋的，就是农学院畜牧场的大批良种牲畜和珍禽。离开南京前，他给畜牧场职工发放安置费，表示能迁出则迁出，迁不出也就算了，校方绝不追究责任。畜牧场场长王酉亭虽然文化不高，但他深知学校的这大批良种是高价采购，来之

不易，也知道优良品种在教学科研上的价值，于是带领全体职工，连夜找来木船，装上“活货”，运过长江，由浦口、浦镇过安徽，经河南，入湖北，走宜昌……后来，由于沿途交通堵塞，雇不到运输工具，职工们只得自行设法将鸡、鸭、兔、龟等小动物装进笼子，驮在荷兰牛、澳洲羊、美国猪身上，就像沙漠中的骆驼队一样的缓缓前进，有时甚至还要手提肩挑的跋涉。经过一年多，行程数千里的烈日烤晒和风霜雨雪，“骆驼队”竟将一大批“活货”一只不少带到了重庆沙坪坝。在校门口，看到衣衫破烂的员工，看着成群的鸡鸭牛羊，罗家伦感慨万千，热泪盈眶，竟抱着这些畜禽亲吻起来。《大公报》报道，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对此泪汪汪地感叹：“抗战时期有两个大学‘鸡犬不留’；南开被日机轰炸得夷为平地，一无所有，而中大的‘鸡犬不留’，是中大的职工历尽艰辛将其全部搬到了重庆。凭着这种不辞劳苦，努力向上的精神，中国绝对不会亡！”

顺利的搬迁为中大保存了元气。1937年11月22日，中大在重庆率先开学复课。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到战败投降的8年时间里，教学活动从未间断。



沙坪坝中央大学礼堂（这是当年中大校区唯一留下的纪念建筑）

西迁后的中大分为四个校区：本部设在重庆沙坪坝、嘉陵江沿岸设柏溪分校、成都华西坝设中大医学院及农学院畜牧兽医系、贵阳设实验学校，而且增设新兴系科，创办国立中央大学研究院。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卓著的业绩都是在日机频繁空袭中创立的。

跑警报、钻防空洞 成为“必修课”

为早日结束中国战争，日军对重庆先后使用“高密度轰炸”“疲劳轰炸”“无限制轰炸”等战术。因为中国领空缺乏有效的保卫，只能被动挨打。1937年9月，蒋介石命令重庆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商店及民众普遍修筑各种防空洞，以减少军民伤亡。



中央大学迁渝纪念亭（在今重庆大学校内，原文学院第一教室处）

据中大森林系几位教授对沙坪坝的空袭统计：1938年10月的一个月內，大雾天有4天，空袭达28天，有一天多达5次。跑警报、钻防空洞成为中大师生日常生活的“必修课”。

1941年2月，美国为了遏制愈来愈强大的日本军队，避免美军的太平洋基地遭受威胁，中美签订《租借法案》，美军提供训练和技术，帮助中国建立一支拥有1000架飞机的空军。1941年7月10日，由美国飞行教官陈纳德率领110名飞行员和150名机械师组成的美国志愿航空队来到中国，被称为“飞虎队”。1942年，西起印度阿萨姆邦，向东横跨喜马拉雅山脉的“驼峰航线”开通，中国空军力量逐渐增强，从1943年8月开始，日本飞机再也没有侵扰重庆上空。从此，中大也得到休养生息，开展多种前所未有的

校园活动。

万花筒里亦精彩

尽管“跑警报，钻防空洞”是中大的“必修课”，物资紧缺，生活也十分艰苦，但师生们的精神生活却非常丰富多彩。特别在1943年8月以后，日本飞机不再侵扰重庆，学校秩序也得以正常进行。

关于学生社团：在学生自治会的组织与推动下，各系科均设有同学会，如史学系同学会、艺术同学会及女生宿舍系同学会等；带有学术性质学会，有生物学会、园艺学会等；有音乐、戏剧、文学、体育、摄影、宗教、感情、品行等各方面协会及研究会；有武术会、拒毒会、不用日货救国会；为推动合作事业，成立全校性消费合作社……名目繁多不下七八十个。

关于文化生活：学生编写的刊物有《野火》（半月刊）、《社会科学》（双月刊）、《法律系季刊》《商学院学生会丛刊》与《国难特刊》等；校园不时举行歌咏会、话剧、土风舞等演出，他们编排的话剧有《雷雨》《钦差大臣》等。师生合作改编《傲慢与偏见》为话剧，并同

台演出，轰动沙坪坝所在的重庆学术、文化中心的沙磁区。

关于名人演讲：每周日，中大必会邀请学界、政界名流或来华使节，如马寅初、翁文灏、潘光旦、李烈钧、孙科、冯玉祥、卢作孚、郭沫若、老舍、曹禺、美驻华大使詹森、英国前首相艾德礼等，周恩来也曾来校讲时事。凡有演讲大会举行，同学们都踊跃参加。他们流行一句话：“课可以不上，讲演不可不听。”

“两月不知饭味”

当时，大学教师的生活待遇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优渥。随着物价不断上涨，教授每月300多法币的工资，仅能购买一石大米（合120市斤）。虽然政府设法提高奖金，实行米贴，增加研究补助费等，但杯水车薪。据《中大周刊》披露：“本校某院长购得玉米一石，磨粉充饥。”“某职员近因面粉价廉于米价，已两月不知饭味。”“师范学院某教授在北碚复旦大学、磁器口教育学院、松溪分校及本校沙坪坝四处上课，为了增加收入。”

1941年夏，中大地质系主任、兼任重庆大学教授的朱森，带领学生野

外实习。而中大、重庆大学两校都给他家送去一个月的平价米五斗（合60市斤）。朱夫人未问清事由就照收不误。有人向教育部与粮食部告发，说朱森重复冒领平价米，教育部长陈立夫竟通令给朱森记大过一次。朱森一生清廉，遭此不白之冤，又气愤又羞辱，因胃溃疡复发住院且病情加重，引起大出血，于1942年7月6日溘然长逝，终年40岁。

尽管教师的物质生活十分艰苦，但不忘教育救国，对学生耳提面命，不改初衷。

旷世通才来治校

1944年8月，教育部政务次长顾毓琇接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

顾毓琇（1902—2002）江苏无锡人。许多人对顾毓琇的名字很陌生。他出身于名门望族。是集科学家、教育家、诗人、戏剧家、音乐家、佛学家于一身。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文理大师。他6岁时就以第一名成绩考进苏州俟实学堂，学习国文、算学、西文（英文）、东文（日文）和体操。1915年，考入清华学校，苦读8年之后，被公派赴美留学，1923年在美国麻省

理工学院学习电机工程。25岁时发表《四次方程通解法》，被国际电机理论界命名为“顾氏变数”，并被国际公认为自动控制理论的先驱。1928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博士学位，成为该校第一位获得科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1929年，担任国立浙江大学电机工程系主任。1931年，任国立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1932年，任国立清华大学电机系主任，无线电研究所所长。1936年，任南昌航空研究所主任。1937年，任长沙临时大学工学院院长。1940年，为国立音乐学院首任院长和国立交响乐团首任团长。1938年，作为无党派人士，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作为佛学家，他的英文巨著《禅史》，备受国际佛学界重视。他兼通文史哲，擅长诗词曲。

顾毓琇与梁实秋是清华学校的同班同学，又是室友。1928年，顾毓琇将高明撰《琵琶记》改编成话剧剧本，由梁实秋译成英语。剧中梁实秋饰演蔡伯喈，顾毓琇任导演兼饰牛丞相。冰心饰演丞相的千金。另有一人扮演赵五娘。闻一多画丞相的蟒袍和布景。全剧在波士顿公演，让美国观众大开眼界。《基督教箴言报》和《波士顿新闻》以大幅照片插图予以

报导。

基于顾毓琇的成就与阅历威望，他对中大的教务治理是游刃有余的。上任时，顾毓琇向报界发表谈话说：“今后的中央大学应注重学术研究，提高学术风气，改善研究人员待遇。盖注重学术为教育人才和培育文化的根本原则。”为此，调整系科，使得不同学派的学术思想空前繁荣，学校面貌大有改观。

在抗战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中大不仅没有停滞，反而进一步充实和发展。1941年和1943年，教育部两次遴选声誉卓著而具有特殊贡献的“部聘教授”45人。中大入选者有居里夫人为中国培养的唯一的物理学博士施士元在内的12人，超其总数的1/4。中大一校的经费，相当于北大、清华、交大、浙大四校的总数。抗战初期开始的全国大学名校“联考”统一招生中，1/3的考生将中大作为第一志愿填报。1941年，中大设有文、理、法、工、农、医、师范7个学院，1个研究院，56个系科，9个研究部，1所专科学校，1所附属中学以及医院、农场、工厂等一系列下属单位。有教授、副教授183人，讲师39人，助教179人。在校学生3153人。全校开设课程829种。1943年，教育部主办第一次自费

留学考试，录取329人，其中62人是中大毕业生，占总数的1/5。1944年，公款留英公费生考取30人，8人为中大毕业生。著名的经济学家陶大镛就是这次出国深造的。

1943年下半年，中国驻印军和援缅远征军未满员，而且兵员身体素质与中低级军官文化素质太差，特种兵严重缺员。因为知识青年有知识，判断能力强，坊间有这么一种说法：“在部队中增加一个知识青年，不啻增加十个普通士兵。”1944年，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5月25日攻陷洛阳；6月中旬攻入长沙；8月7日攻占衡阳，稍事休整又沿湘桂铁路南下，连续攻陷桂林，日行百里，如入无人之境。为鼓励从军，蒋介石特令蒋经国、蒋纬国参加远征军服务工作，一些省、市、县的长官也送自己的子弟去报名，青年学生投笔从戎成为当时大潮流。

在此情势之下，顾毓琇向蒋介石进言：“根据近年日本国内招募童军与美国对日宣战等情况来看，在今后一年至年半内，日本必然走向衰亡。知识青年踊跃从军固然精神可嘉，但困兽犹斗，远征军难免有所牺牲。我国战后百废待兴，中大、西南联大等校的高材生是建国复兴的有生力量。

政府必须考虑适当劝导他们，努力求学，立志报国。”蒋介石深感同意。

1944年9月1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办法》，在全国各地征集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青年编组青年远征军，简称“青年军”。《征集办法》规定：男性年满18周岁至35岁，身体合格，服役期两年。远征军以不接收难民为底线，还特别规定了在校学生从军可保留学籍、退伍后免试升学、减少学期、优先录取等优待办法。10月14日，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员会成立，蒋介石兼任主任委员，委员25名。顾毓琇名列第四，在军政部长何应钦之上。

“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响彻云霄。中大和其他院校一样闻风而动，报名队伍排成长龙。经国民政府办理青年志愿从军登记甄选，合格者125500人，超额完成“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征集任务，编成9个师。之后，青年军先在各基地接受集训1至3个月。1945年1月底开始，分批出征，支援北上的英国缅甸军，共同对日军作战，打通了中印公路、滇缅公路、史迪威公路的大通道，为中国战区、印缅战区胜利完成了大反攻。

回迁南京

吴有训（1897—1977），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1920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1年赴美留学，在芝加哥大学以系统、精湛的实验为“康普顿反应”的确立作出重要贡献。他于1945年至1947年担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并希望亲手把母校打造得更加辉煌。吴有训对全体师生说：“我来中大，只凭着为母校服务这点关系。”

他上任不久之后，抗战取得了最终胜利，吴有训的首要任务便是繁重的复员工作，在他的精心谋策与周密组织下，1945年9月底，国立中央大学复员委员会成立，复员经费为法币81亿元。全校师生员工及家属12000多人分8批返回南京。1946年5月，第一批师生返回，最后一批师生于7月底返回。图书仪器设备4700余箱及私人行李近万件，大部分由民生公司承运，由卢作孚征求董事会的同意，只收成本，于10月中旬陆续安全到达，耗时不到5个月。连蒋介石也称赞不尽：

“没想到这个吴老夫子教书好，办事也这么干净利落。”

中大复员后的规模已是战前的三四倍，除四牌楼原校址外，又在丁家桥新辟校址。同年9月复课。1946年9月，中大拥有7个学院（文、法、师、理、工、农、商），37个系，6个专修科，26个研究所，是当时中国系科设置最完备的大学。在1948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世界大学排名中，国立中央大学超过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名列亚洲第一。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5月7日，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国立中央大学。8月8日，国立中央大学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1950年10月10日，接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通知，国立南京大学校名去掉“国立”两字，称“南京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在大陆成为历史。

时隔54年之久，中大迁渝纪念亭位于重庆大学松林坡，由重庆中央大学校友会于1995年设立。八根圆柱支撑亭顶，象征学校八个学院。八级石阶拱卫亭门，标志八年全面抗战艰辛。为提醒同胞勿忘国耻，亭顶一座警钟长鸣。花岗石碑矗立亭心，铭刻迁校九年鼎盛。

（作者系温州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员）

僧侣“复生”记

◇ 明 人

一

我的老家在市郊新桥西堡。

20世纪60年代末期，在村子西头临河的田野边上，有一个叫“复生”的工厂。那时，我还小，约七八岁光景，对它的印象，是几幢红砖平房和一幢小楼房耸立在河边，如鹤立鸡群。工厂停产已久，荒废在此，厂门敞开，仅每幢厂房的门紧闭着。我常和小伙伴到“复生”那儿玩，躲迷藏、“捉不动”，爬到桑树上摘桑葚，爬上柳树上折柳枝、扎柳条帽，扮演解放军叔叔匍匐在地做埋伏、打冲锋。记忆里，在“复生”这个神秘之地游玩的童年，就如一曲田园牧歌般美好。不过，“复生”厂子全名叫什么？做什么产品？创办于何时？是什么性质的企业？我一概不知，甚至连“复生”是哪两个字都不晓得。

成人后，世事繁杂，生活负重，

关于“复生”的来历也就没去追究了，只是偶尔在夜深人静时会想起“复生”，心底里暗暗纳闷：“复生”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直到最近写作《传家记》一书，在写到父亲早年的工作经历时，从父亲那听说他年轻时曾在“复生”工作过，时间很短，不到两个月。由此，揭开了“复生”的神秘面纱。

二

父亲清楚地记得，到“复生”工作的时间是1957年12月。那时，他刚从遂昌造纸厂辞职回家，闲着无事可做。通过村人介绍，父亲进了“复生”做临时工，当抄纸工人。由此得知，“复生”全名叫温州市复生造纸厂，主要生产雨伞纸等纸产品，工厂的工人基本都是还俗的和尚尼姑、道士道姑。原来，“复生”就是由这一拨僧侣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创办，厂名

“复生”，即取自僧侣还俗、重新生活之意。

新中国成立初期，温州一些寺庙不少僧侣还俗，参加手工业生产劳动。据《温州市志》（1998年版）记载，1949年，温州地区有僧尼2800多人，温州城区有180多名僧尼。当时，市区九山河畔的準提寺、东城下的城下寮，大多僧侣还俗，创办造纸作坊，生产雨伞纸等。这两个寺庙靠近河畔，人工洗料就在河里作业（当时尚无环保概念），捣浆（制浆）从河里汲水，适合兴办造纸作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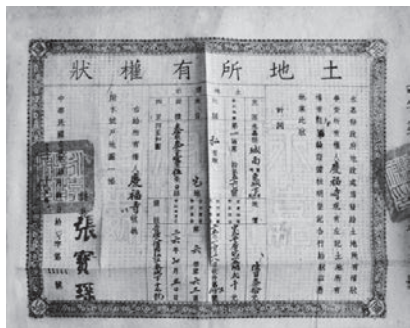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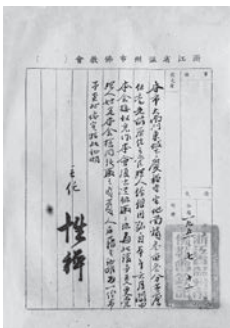
几经辗转，我找到了几位原“复生”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以期还原“复生”的原貌。

原“复生”老工友，现已90多岁的老人陈慧因，精神矍铄、思维清晰。她回忆道，年少时由于生活所迫，在城下寮出家，20世纪50年代初期寺庙僧侣集体还俗时，她才18岁。当时，庆福寺连同其他几个寺庙，卖掉了寺里值钱的几口铜钟，筹集资金创办造纸作坊。作坊开头只有20多名工人，后扩充到40多人。1950年，他们办的是“集厂”，到了1951年，政府派佛教会的性禅来领导他们创办造纸厂，并正式挂牌成立复生造纸厂。大概是1955至1956年间，政府投资主

导，在市郊新桥西堡村征地建起一个有多幢房子的工厂，复生造纸厂搬迁至此。他们一家就租住在西堡村一农户家里，租住了七八年，她的第二个儿子就在那里出生。

陈慧因老人从小勤奋好学、天资聪明，且口才好、记忆力好，像《心经》《金刚经》等，都倒背如流。还俗上班后，她专心学习生产技术和知识，从焙纸、投料工种做起，后担任厂行政科长等职务，在管理方面很有一套，实现了从尼姑到创业者的华丽转身。1976年退休后，她还担任社区居委会主任，那时的居委会主任可是真正的“百忙官”，并且没有工资，可她一干就是二三十年。如今，她仍坚持每天看新闻和戏剧节目，由于视力欠佳，多以听为主。

据史料记载，1951年，温州市佛教会出具委托书一份，委托庆福寺（俗称城下寮）管理人因弘法师办理寺庙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将原寺庙管理人因弘更改为复生造纸厂。全文如下：“本市大南门东城下庆福寺宅地面积三亩三分壹厘五毫，先前原宅之管理人系僧因弘，自本年六月间由本会接受充作复生造纸厂厂址，为此请予变更管理人姓名，本会检同该厂之负责人之户籍证明书一份，希予查对



图左：弘一法师与因弘法师（城下寮）合影

图中：1951年温州佛教协会委托因弘办理产权证明书

图右：民国期间庆福寺土地所有权证

信实，特此证明。”由此可知，庆福寺原寺庙产权是为僧（住持）因弘，1951年由市佛教会接受充作复生造纸厂厂址，产权人由因弘变更为复生造纸厂，故复生造纸厂归口市佛教会。据老工友推测，当时的“复生”很可能是一家集体性质的企业。

“复生”挂牌后，厂址几经变迁。

原市佛教会副会长徐祖光先生在其所著的《憨憨室笔缘》中写到：1950年，为了支援居士们生产自救，寂老（寂山和尚）自愿让出庆福寺五间房屋，免费让李德胜、吴国理、徐祖光等居士创办“大众文具工艺社”，实行住持、生产两不误。1951年，随着“土改”等社会的变革，城

镇僧尼纷纷组织起来生产自救，市佛教会在民政部门的带动下，由性禅、雪生、因净等负责在準提寺（市区胜昔桥）筹办复生造纸厂，市区大部分寺庙僧尼都参加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1953年，复生造纸厂因生产发展，从準提寺迁至庆福寺。1955年初，庆福寺归还市佛教会，重新修葺，成市佛教会会址。

原“复生”老工人陈忠庭先生，现已87岁高龄，他记忆甚好，思维清晰，还记得当年一起到“复生”上班的十几位村人的名字。他回忆道：20世纪50年代中期，“复生”属于国营企业性质，共征用西堡村土地16亩，建了几幢红砖厂房。凡有被征用的农户不管被征用田亩多少，一户一个工



温州打字蜡纸厂早年手工抄纸车间

作名额。他家被征地1.6亩，他和村人谢庆池等10人，外加村子里被特殊照顾的困难户6人，于1957年被安排到了复生造纸厂工作。他们进厂后，男的当抄纸工，女的从事拣皮、开纸等工作。当时，“复生”在职的正式职工有120多人，除了因土地征用进厂的16人及从103砖瓦厂调过来的4人，其他职工都是还俗的僧侣。

三

“复生”位于西堡村西北角，原是一片半岛型田野，三面环会昌河，河畔杨柳依依，碧波荡漾。厂子东边有一个码头，可用于装卸货物，北边另有一个渡船的埠头，用于人渡，与对岸的西山路相连，方便行人。“复生”选址此地，离市区近，运输方

便，具地理优势。

父亲说，“复生”厂里的不少职工就租住在村子里，上下班时都能碰见。“复生”生产的雨伞纸，销路好，常常供不应求。厂里还有一位女警察，担任门卫。大人常拿她来吓唬孩子：“姆，你不‘仙能’，警察婆会走来把你捕慨皇。”（温州方言，大意为：姆，你不乖，警察婆会把你抓去哦）

原温州打字蜡纸厂老工人吴永立先生，曾任该厂技术科、生产科长，现已90多岁高龄。他于1951年进厂，对早年的情况比较熟悉，他介绍道，温州打字蜡纸厂创办于1951年6月，政府投资7000万元（旧币）作为开办经费。1953年迁至西山路白泉（西山路当时未建）建起新厂房，系我市的老牌国营企业，曾生产过雨伞纸、皮纸、白棉纸（蜡纸原纸）、滤油纸、打字蜡纸等，曙光牌打字蜡纸享誉全国。1958年，温州打字蜡纸厂需扩大生产规模，一河之隔的“复生”便正式被并入了这个国营企业。“复生”被合并后，厂房成了打字蜡纸厂的原料仓库。想来我小时候看到厂里各房门紧闭着，正是已充当仓库囤放货物的缘故。

现在市区经营一间婚庆公司的



原复生造纸厂遗址，
现为省第十一地质大队

张先生曾著有一文，怀念他外公外婆的僧侣还俗经历。文中写到，其外公外婆解放前在温州郊区的两个寺庙出家，但他们当时少年出家并不是因所谓的“看破红尘”，而是被生活困苦所迫。他俩还俗前，由于因缘巧合已经相识，并暗生情愫，但因身在庙宇，只能苦苦暗恋。20世纪50年代初期还俗后，有情人终成眷属，政府安排他们到了复生造纸厂上班，并分得位于市区胜昔桥的一间半婚房。他们婚后先后生了4个女儿。退休后，由其两个女儿顶替他们在打字蜡纸厂工作。外公退休后帮人做些法事，外婆是虔诚的佛教信徒，每天念佛祷告，祈福国泰民安，感谢共产党给他们带来的新生活。外公外婆的俗名叫潘锦夫、王美钗（法名已忘），在滔滔的

历史长河中，他们是一朵小小的浪花……

四

时至20世纪70年代初期，“复生”原址划归给浙江省第十一地质大队，地质队在原渡船埠头建了一座桥，名为地质桥。

《温州市志》（1998年版）的三卷本中有如下一段文字记载：“本世纪50年代初期，温州有些僧侣还俗，不少寺院改作他用，当时僧侣生活困难，人民政府扶持其生产自救。”一段简短的文字记录，依稀记录并印证了复生造纸厂创办的历史背景。

（作者单位：温州都市报）

伟绩载党史 丰碑留民间

——吴毓传略

吴毓（1911—1943），又名吴祖育，浙江平阳南宋垟大埔山村（今属苍南县）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驻温州办事处主任、新四军驻浙江办事处主任、中共浙江（临时）省委统战部副部长、中共永（嘉）瑞（安）中心县委书记等职。1943年被杀害。

吴毓，1911年出生于浙江平阳县南宋垟大埔山村（今属苍南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6年，他考入温州瓯海公学（今温州市第四中学），立志“苦攻科学，使国家强盛起来”。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被葬送了。东南一隅的温州，也处在白色恐怖之中。吴毓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被开除，而且目睹不少品学兼优的同学以及教师遭受国民党政府逮捕、通缉，如此种种令他对国民党的统治感到不满，在心中种下了立志改变现实的斗争种子。

1929年，吴毓从温属联立商校毕

业，考入上海持志大学。不久，该校被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取缔，他又进入上海君毅学院读书，后因家



庭困难而辍学。吴毓目睹了祖国贫穷落后、饱受欺凌的现状，发出了“浩浩苍天，何其无情如此耳”的慨叹，执着地求索救国救民的道理。

1931年，吴毓常与朱程等进步青年到附近农村去进行反对封建、破除迷信的宣传活动。这引起了当地土豪劣绅的强烈不满，吴毓又被迫辗转闽南，去上海等地，后返回平阳，继续在水头、灵溪等地小学任教。

1934年夏，吴毓由朱程介绍到北平国民党第二十五师教导队任职。1935年秋，吴毓到南京，与在国民党军政部化学兵队学习的陈铁君等商议寻找共

产党组织，未果，后南下回到平阳，与叶廷鹏取得联系。他们以共产党的名义深入北港、凤林一带活动，并组织了一支游击队。1936年5月，他们成立了中共浙南临时革命委员会，叶廷鹏任书记，吴毓负责组织工作，并在北港和平（阳）瑞（安）边境开辟了一块纵横30余里的秘密工作地区。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变本加厉地对一切革命力量实行血腥镇压，不少意志薄弱的人脱离了革命、脱离了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吴毓等人仍然敢于拿起武器和国民党作斗争，并取得了成果，这种强烈的革命斗志与无畏的精神确实难能可贵。

1935年3月，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到达浙西南后，浙江的革命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年9月，刘英、粟裕率挺进师主力进入浙南。11月，刘英、粟裕和闽东特委书记叶飞在泰顺白柯垵举行联席会议，宣布成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1936年9月，陈铁君率领的红军游击队在瑞安、平阳交界的葛藤湖和红军挺进师一部会师。当日，两支队伍移师包垵，叶廷鹏、郑海啸到达包垵与粟裕会晤。粟裕传达了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决定在浙南建立游击根据地的指示。叶廷鹏汇报了浙南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活动地

区及斗争生活情况，并主动提出接受闽浙边临时省委的领导。从此，吴毓就在闽浙边临时省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这期间，闽浙边临时省委通过浙南临时革命委员会和中共中央上海办事处取得了联系。从此，红军挺进师与党中央恢复了联系。

1936年10月，吴毓被调到上海受训，为期两个多月。这是他第一次接受党的系统教育，政治理论水平有很大的提高。结业后，他被指定为中共中央上海办事处和闽浙边临时省委之间的政治交通员，于是经常往返于上海和浙南两地。

1937年1月，中共中央上海办事处副主任冯雪峰写信给刘英，信中提到浙南临时革命委员会由闽浙边临时省委领导，并请省委就近解决吴毓等人的党籍问题。虽然吴毓直到当年12月才由刘英、粟裕介绍入党，并参加了在临时省委机关举行的入党宣誓仪式，然而事实上早在这以前，临时省委就已对吴毓委以重任了。

1937年3月，吴毓受命回浙南，他从上海带回同年2月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五项要求，四项保证”电文等文件，准备转给闽浙边临时省委。其时正值国民党闽浙赣皖四省边区主任公署主任刘建绪执行

蒋介石“北抚南剿”的方针，向红军挺进师与浙南游击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清剿”的时期，道路被严密封锁，吴毓无法和临时省委取得联系。他同在温州城区的白区工作团的黄先河、周饮冰、黄耕夫等人商量研究后，以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临时省军区的名义，发布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致国民党闽浙赣皖边区主任公署和闽浙两省当局的快邮代电》，于3月25日分头从永嘉、乐清、瑞安、上海等地投邮，呼吁国民党当局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以民族利益为重，摒弃前嫌，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提议双方迅速派出代表举行和平谈判。这封《快邮代电》，不仅说明吴毓敢于负责的精神，也可以看出其敏锐的洞察力与政治预见力。当时，在南方各根据地中提出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和谈的，浙南是较早的一个。

国民党浙江地方当局接到《快邮代电》后，在5月2日的《浙甌日报》上刊登启事，表示愿意与闽浙边临时省委代表“面洽”。吴毓见到启事后，在临时省委白区工作团的协助下，就以临时省委联络员的身份同国民党第十九师旅长唐伯寅以及刘建绪的代表邓切取得了联系，商定双方先

停战一周，以便红军商派正式代表举行和谈。

吴毓、黄先河借停战之机，得以通过封锁线进入平阳北港山区向刘英汇报。根据刘英的指示，吴毓等人为闽浙边临时省委谈判代表，于5月中旬先后在平阳鳌江和温州城区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此次谈判，吴毓等闽浙边临时省委代表提出五项保证和五项要求，但国民党当局对这次和谈毫无诚意，提出极其苛刻的条件。显而易见，国民党当局想在谈判桌上达到他们在战场上所没有达到的消灭红军和浙南游击根据地的目的。这遭到了吴毓等人的拒绝。为了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吴毓等人提出：“闽浙抗日红军在国难当头的今天，不忍内战的再续，因此，情愿舍弃一切，集中开赴东北或西北抗日去，但贵方必须让出抗日路线。”谈判破裂后，临时省委谈判代表身居城区，处境十分危险，吴毓机智地摆脱了国民党的监视，安全地返回根据地。

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24日，吴毓等再次作为闽浙边临时省委谈判代表同国民党地方当局在温州重开和谈。在谈判中，闽浙边临时省委代表在坚持共产党独立、批评自由，以及保持红军武装独立性等的前提

下，作了适当让步。国民党方面也不再坚持原先的苛刻条件。谈判双方经过几次协商，终于达成浙江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协议，并签字生效。

谈判的成功，标志着浙江第二次国共合作新局面的开始。担任临时省委首席谈判代表的吴毓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运用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斗争艺术，显示出杰出的才能。

1937年12月1日，吴毓担任了由红军挺进师改编的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驻温州办事处（后改名为新四军驻温州通讯处）主任。1938年3月，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由粟裕率领开赴皖南集中编入新四军第二支队，吴毓担任了设在丽水的新四军驻浙江办事处主任，成为闽浙边临时省委与国民党地方当局之间的主要联络人。

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和新四军办事处，是共产党的公开机构，为抗日救亡运动和统战做了大量的工作。如1938年1月，闽浙边临时省委在平阳山门创办抗日救亡干部学校（对外称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救亡干部训练班）。在《浙瓯日报》公开刊登招生广告，报名地点之一是设在温州城区九柏园头的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办事处，由吴毓主持招生工作。温州城区很多学生通过办事处的介绍，

前往山门抗日救亡干部学校报名。

1938年5月，吴毓担任中共浙江临时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是浙江临时省委书记兼统战部长刘英的主要助手，同时还兼任浙南特委统战部长，担负着极繁重的统战工作。10月，国民党地方当局制造了“九柏园头事件”，封闭了新四军驻温通讯处，逮捕了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谢文清和省委常委、青年部长赖大超等7人。吴毓以新四军驻浙江办事处主任的合法身份到国民党温台戒严司令部交涉，并到看守所看望被捕的同志，还带去省委书记刘英给他们的信，指示他们团结一致、坚持斗争、静候解决。该事件发生后，省委为避免损失，主动撤销了新四军驻浙江办事处和新四军驻闽浙边后方留守处。

1939年3月，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公开身份视察浙江，会见黄绍竑时，与之达成口头协议：在抗战中遇有问题，由浙江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吴毓代表中共方面同黄绍竑直接商量解决。4月，浙江省委在丽水成立统战工作领导小组，吴毓任组长。7月，吴毓作为省委机关代表参加在平阳召开的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省委统战部副

部长。12月，浙南特委决定建立中共永（嘉）瑞（安）中心县委，吴毓任书记。他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白区工作的方针，致力加强永嘉、瑞安两县游击根据地党的建设。随着国民党的反共活动愈演愈烈，形势日益恶化，吴毓的合法公开活动也越来越困难，但他仍不放过每一个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机会。他一直坚持到1940年1月才撤出城市，进入基本地区。1942年3月，吴毓任中共浙南特委委员，并任浙南特委驻纸山办事处主任，指导永嘉、瑞安两县工作。次年2月，吴毓调任中共浙南特委江北（括苍）办事处主任，指导瓯北、乐清（包括玉环）两县工作。

吴毓到江北办事处时才过而立之年，却留起长须，他穿长布衫，戴瓜皮帽，手持玉嘴长烟管，俨然是一个乡村教书先生，人们称他为“长胡老人”。1943年7月底，吴毓在楠溪牛栏塘召集瓯北、乐清两县党的负责同志开会，传达特委的石硯会议精神，总结了一年来“隐蔽精干”工作的经验，同时贯彻华中局提出的地下工作总方针：避免与破坏国民党的进攻，保持与发展自己的力量，以达到长期埋伏、储蓄力量、等待时机、配合全国的目的。会议决定加强对群众的政

治教育，开展党内的学习运动，积极开展新区工作。后来又在罗川开会，部署反国民党的“清乡”斗争。

10月，国民党在永嘉枫林成立“闽浙赣三省边区绥靖指挥部第十四督剿处”，主任曹集云实行政治、军事双管齐下的策略，部署在瓯江以北地区“清乡”，一面派兵进攻，一面又纠集叛徒、特务组成“肃奸队”，破坏党的基层组织和交通联络网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未能得逞，叛徒、特务却破坏了不少基层党组织，江北办事处与浙南特委的联系也中断了。为此，吴毓决定把在瓯北已暴露身份的难以立足的干部送到浙东抗日根据地去。

11月中旬，曹集云部进攻岭头、中堡、小陈等地，被武工队和武装群众击退。小陈战斗结束后，吴毓决定向北发展，在永嘉、仙居、黄岩边境的黄山一带开辟新的工作区域、建立新的隐蔽点。黄山这个地方，山深林密、人烟稀少，国民党统治鞭长莫及。但这里盘踞着几股土匪武装，要进黄山，首先要与土匪打交道。吴毓先派人去黄山，找土匪头目余汝苟等商谈，希望和他们联手同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余汝苟等表示同意，并约

（下转第100页）

山门菁英 长漏女杰

——林心平传略

林心平（1919—1942），原名林秋逸，又名秋侠，化名梁玉，浙江平阳县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江苏溧阳新昌青年抗日救亡团组织者，曾任金坛、溧阳、宜兴、武进、丹阳5县联合政府文教科兼官村区区长。1942年壮烈就义。2014年入选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林心平，1919年出生于浙江平阳县北港五十都（今属山门镇）西山村，后迁居水头街（今水头镇）。祖上世代务农，其父林介人是水头山门一带的名中医，全家八口人靠他行医的收入糊口，虽收入微薄，但贫穷乡亲看病常常不收取报酬。

1928年，林心平进入平阳县立第七完全小学（今水头镇第一小学），学习勤奋，名列前茅。她关心时事，常读报纸杂志和英雄传记，并改名秋

侠，以示效仿革命女侠秋瑾。她小学毕业后，因家庭经济拮据而辍学在家，帮母亲做点针线活或到附近

的茶场打短工，以资助家里。这时她的哥哥林怡（后改名杨进）已参加革命，常常在来信中给她启发和引导。

1935年秋，林心平以优秀的成绩考入温州师范简易部（简称“温师”）。不久，一二·九运动爆发，温州地区青年学生掀起了抗日救国热潮，温师学生冲破当局阻挠，走出校门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她联络同学、组织宣传队、办校刊、举行罢课示威游行，成为学生运动领导人之一。国民党反动当局指使校方警告林心平：若退出学生运动，可给以最高的公费待遇，毕



业后还可优先介绍职业，否则就开除。林心平毅然回答：“开除，不怕！要我不宣传抗日，做亡国奴，办不到！”就这样，入学不到一年，她就被学校开除，回了家。她的表姐蔡翠云因积极参加救亡运动也被开除。她就秘密串连表姐蔡翠云，决心参加革命。这时，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到了浙南山区，林心平和蔡翠云就上山找已参加浙南红军游击队的大哥林怡。通过努力，终于与正在当地活动的游击队取得联系。为了考验两个小姑娘的胆量和勇气，游击队交给她们一份《浙南反帝大同盟告浙南青年书》，要她们回去刻印散发。她们欣然接受了任务，向水头小学工友借了誉印工具，连夜刻印了数千份，散发、张贴到镇上几千户人家的门口。国民党当局知道后大为惊恐，在平阳北港凤卧、水头进行大搜捕。当时，蔡翠云住在林心平家，国民党从林心平的网篮里搜去一张传单，就这样，她俩被当作“共匪”抓走了。

林心平被捕后，先是受到敌区长的严刑审讯，后又转押县法庭审讯。但不论敌人如何审讯，她都沉着镇静、不吐真情，义正词严地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决不能坐等做亡国奴！难

道你们不抗日，也不准人民宣传抗日？！”驳得敌人哑口无言。经地下党多方营救、工商界出面担保，一个多月后，反动当局迫于社会的压力，只得将林心平她们释放。出狱后，林心平与红军游击队取得了联系，参加了游击队。出于对抗金女英雄梁红玉的敬慕，她化名为“梁玉”，成为一名光荣的游击战士。

1936年9月，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与浙南红军游击队在平阳、瑞安交界山区会师，浙南红军游击队主动接受挺进师领导。挺进师政委刘英、师长粟裕欣喜万分，要求浙南方面尽快派人把刘英写给党中央的报告送达上海地下党转陕北党中央。组织上把这个光荣任务交给刚刚入伍、年仅17岁的林心平，林心平当即表示：“宁可丢头颅，决不失密件。”

在国民党重兵“围剿”、鹰犬密布的情况下，为了安全，林心平乔装打扮，只身一人，绕开岗哨与大路，翻山越岭，日夜兼程，跋涉200里，到达温州城区。在地下党的安排下，乘船于9月中旬到达上海，把密件交给了上海地下党。党组织很欣赏林心平的机智勇敢，便把她留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交通工作。同年11月，林心平加入中国共产党。

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八路军驻沪办事处成立，林心平调办事处任机要秘书，出色地完成了领导交代的各项任务，得到李克农、潘汉年等领导的好评。后日军占领上海，办事处遂转入地下，11月，组织上又派她到延安参加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第三期学习。经过学习，她的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

1938年8月，林心平奉命提前结束抗大学习，被派往武汉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当时，党组织派林心平打入武汉国民党“忠义救国军”战地服务团。她隐匿党员身份，化装成流亡学生，当上了“忠义救国军”战地文工团的政治干事。同年秋，国民党要把参军的这批青年拉到屯溪进行特务训练。林心平立刻将此消息报告上级党组织，并提前采取行动，帮助许多进步青年集体离队，奔向闽浙地区，分别参加新四军、游击队及各地抗日救亡工作。林心平也离团归队。1938年冬，林心平调中共金衢特委，在开展上层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中得到好评。1939年春，她被调到中央东南局妇女部，开展妇运工作。

1939年秋，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迅猛发展，中央东南局决

定，派出一批干部去那里，以贯彻中央“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1940年初，林心平主动要求调到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工作，在一支队任文工团副团长。这年冬天，林心平参加开辟金坛县新昌地区工作。在当地爱国青年蒋万象的协助下，她在一个月时间内办起了有300多名成人的夜校。她白天备课印讲稿，还挤时间进行家访，了解农民思想和需求，根据实际需要开展教学活动。同时，她还被聘为由陈毅创办和领导的光华中学的音乐教师，并主动到周围十几所小学教唱抗日歌曲。林心平以夜校学生为基础，组织了120多人的“青抗团”，并在团内发展一批党员，建立了党支部。然而她并不满足现状，决心将“青抗团”建成地方武装，于是与团长蒋万象面见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蒋廷鉴，对其晓以抗日大义，促成了自卫队与“青抗团”合编为抗日游击队。从此新昌地区有了一支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一些国民党顽固分子不禁哀叹，想不到新昌地区竟被一个黄毛丫头赤化了。

1940年夏，大批国民党军队进驻苏南，四〇师特务营进占金坛西南游击区的潘家村，组织特务情报网，限制游击区发展，派捐收粮坑害百姓。

这时，林心平奉命到中共金坛西南区工委工作，她认为特务营人多、武器精，加上驻村四周环水、筑有炮楼，决定先礼后兵、争取其抗日，如其坚决反共，则采取里应外合的办法割掉这个“毒瘤”。林心平化装成金坛城里的青年学生，潜入特务营当了文化教员。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摸清了特务营的实力和活动规律。她迎合顽固派的野心，向特务营长李明建议，每天出操后学习唱歌，把部队练成一支能文能武的王牌军。同时她也掌握了李明每天要去乡长家抽大烟的规律，秘密向组织报告，密约了行动计划及暗号。行动这天，她故意让各连互相拉唱歌，让李明远离。新四军短枪队按计划行事，先摸进顽军炮楼消灭了哨兵，后绕到顽军后面，兵分两路，迅速控制了顽军架在那里的枪支。不久，李明被另一支短枪队在大烟床上活捉。就这样，未放一枪、未伤一人，解决了这支顽固派的武装。

皖南事变后，林心平倾注全力搞好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教育工作。1941年春，林心平与新四军六师十六旅四十七团团团长兼长溇县长诸葛慎结婚。3月，金（坛）溧（阳）宜（兴）武（进）丹（阳）5县联合政府成立，林心平任县政府文教科长。她根据党

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领导制定抗日救国的教学大纲，初步改革了旧教育。她组织发动群众创办了几所中小学，亲自对各校师生进行抗日宣传教育，并逐步将交通要道附近的师生组织起来站岗放哨、提供情报。她还动员一些青年学生参加新四军。

这年夏天，国民党保安九旅的3个团投降日军后，进驻长溇地区，企图配合敌人合击中共领导的抗日部队。为恢复和巩固抗日游击区，党组织决定让林心平兼任林区（今宜兴市官林镇）区长，以开拓长溇东南边区，扩大人民抗日武装，牵制日伪军的力量。林心平带了6名短枪队员，一面做地方政府人员思想工作，鼓舞斗志、坚定信心，号召军民做爱国志士，识时务、明大义，团结抗日救中国；一面贴标语、布告，严正警告伪顽头目、汉奸特务，破坏抗日绝没有好下场。这对于敌伪是很大的震慑，为此，汉奸派出特务，四处搜捕林心平。林心平带领同志们在芦苇滩安营扎寨，在青纱帐里与日伪军周旋，忍受日晒水泡、蚊虫叮咬、忍饥挨饿的艰苦生活。她非常乐观，曾作诗：“星月当灯照，割捆芦苇作床铺；敌寇汽艇围湖绕，一觉睡到天大亮；笑敌逞强能几时，看我英豪战旗飘。”

经过林心平3个多月走村串户的工作，干部群众思想稳定了，组织活动逐步恢复。一天上午他们在田间与农民一起劳动，突然来了好几个冒充新四军的特务要找林区长。林心平见势不妙，一边急忙向同志们使眼色，一边回答道：“刚刚向东去了。”结果后面赶上来的密探大声叫喊：“快抓，她就是林区长！”林心平与队员们掏出手枪射击。几个特务应声倒下，后面的则拔腿就逃。事后，林心平决定除掉汉奸特务头子蒋四麻子，杀一儆百。在一个夜晚，他们冒着大雨，翻墙入院，把蒋四麻子打死在床上，将判决书放在尸体上。汉奸特务闻风丧胆，惶惶不可终日。

有一天，林心平带3位同志正在伪军据点不远的宜庄边草棚开会，一个儿童送来情报：3个伪军来村催粮，要群众烧饭给他们吃。林心平听后立即带上3位同志，冲进屋内，缴下他们的枪支，严正对他们说：“我们都是中国人，是同胞，是兄弟姐妹，应该团结起来抗日，今天不杀你们了，饭也不要吃了，回去告诉你们队长，不要死心塌地做鬼子的帮凶，今后不准给鬼子带路，不准征粮派捐、抢粮、骚扰百姓。否则，蒋四麻子就是你们的下场。”3个伪军连声答应。林心平不

畏艰险，带领区干部在险恶的环境中忘我工作，力挫日伪军，打开了团结抗日的新局面，激发了群众的斗志，恢复和巩固了区乡政权。

1942年5月，林心平因产后病需治疗，中共金坛县委决定派她到长溇地区儒林镇，边治病边工作。县委通过爱国士绅将林心平隐蔽在“树德堂”中医馆诊治。7月中旬，因内奸向日伪头目吴苏密报，“树德堂”被包围。林心平沉着应对，边点火烧毁文件、记录本，边镇定倚门射击，终因寡不敌众、弹尽被捕。

吴苏抓到林心平，如获至宝，将她“接”至官林据点，派重兵把守。他假惺惺地左一句“对不起”，右一句“不得已把你请来”，还口口不离“林区长，委屈你了”。林心平不予理睬。吴苏十分尴尬地说：“请你来，没有别的事，只是请你写封信给你丈夫诸葛团长，请他把缴我的枪支全部还我，这就送你回去，怎么样？”林心平勃然大怒，转身痛斥：“日本侵略军奸淫烧杀，你吴苏投靠敌人，是民族败类，你干尽坏事，人民与你誓不两立，你跑不了！要头你拿去，要枪半支没有，无耻之徒！”吴苏又厚颜无耻地说：“要替自己想想，你才二十来岁，将来还有享不完

的福。退一步讲，你也该想想你那刚刚落地的儿子嘛。”接着又威胁说：

“要知道把你往日本人那里一送，那就算掉到狼窝里去了。”林心平大义凛然，仰天长笑：“我虎穴闯过，狼窝不怕！共产党人生当人杰，死也为鬼雄，被你抓来就没有想活着回去。”吴苏气急败坏，将林心平押去日军据点，她昂首挺胸行走在街上，高呼：“今年打倒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鬼子，抗战一定会胜利，新四军一定会解放你们……”街上群众掩面哭泣。

在日军据点里，林心平天天痛斥来劝降的日军和汉奸，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她始终威武不屈。8月上旬，一个下着蒙蒙细雨的黑夜，林心平被押到官林小学操场后面的树林中，她意识到敌人要下毒手了，她拼着最后一口气，大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走狗！共产党是杀不

完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敌人用刺刀捅杀了她，惧怕林心平在苏南地区的抗日威望，为了毁尸灭迹，还残酷地用硝镪水销毁了她的遗体，妄图完全抹去她在当地老百姓心中的影响。林心平壮烈就义时年仅23岁。

林心平的一生虽很短暂，但光彩绽放。她为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以她那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兑现了她的入党誓言，她不愧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被人们誉为“长溇女杰”。新中国成立后，江苏省宜兴县人民在烈士牺牲地点竖碑建墓，寄托人们对林心平烈士的深深敬意。

2014年，林心平入选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文章来源：《浙南百名英烈传》）

蟠龙在湾 魅力之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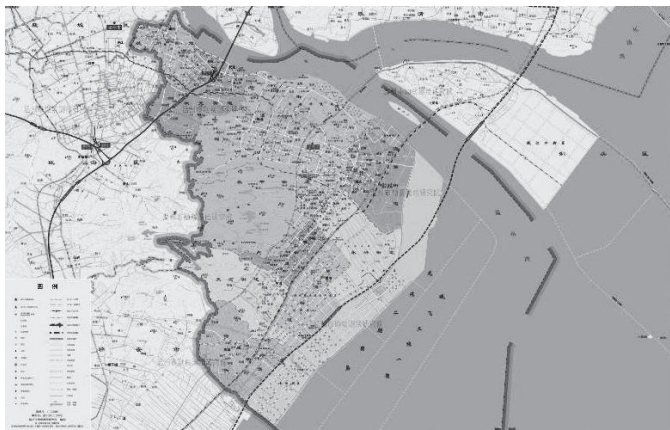
◇ 温州市龙湾区地方志研究室

龙湾是温州四大城区之一，位于瓯江口南岸，东濒东海，与洞头隔海相望，通过瓯江南口大桥、灵昆大桥与洞头区相连，南接瑞安，西靠鹿城、瓯海两区，北临瓯江，与乐清市、永嘉县隔江相望，陆域面积323.09平方公里。

2020年全区户籍人口

34.23万，常住人口72.50万人，下辖10个街道。

龙湾历史悠久，古属瓯越、东瓯。早在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这里就有先民居住，过着渔猎和原始的农业生活。春秋战国时期，龙湾成为越国辖地。从东汉末年到三国，北方处于战乱之中，这一带却比较平静安定。唐宋以来，龙湾作为温州城的东部城郊，经济文化不断发展。1984年12月，国务院批准建立龙湾区。



龙湾地图

龙湾位于瓯江入海口南岸，位于北纬 $27^{\circ}48'$ — $28^{\circ}01'$ 、东经 $120^{\circ}43'$ — $120^{\circ}55'$ 。龙湾区的东部地形是地势低平、河网密布的滨海平原，西部是以岩体裸露为特征的大罗山，大罗山以西为温瑞平原。境内出露地层为中生界侏罗世、白垩世火山沉积岩和第四纪沉积层。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湿润气候，一年四季分明，气温适中，雨量充沛，日照充足。

龙湾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历来



温州龙湾国际机场T2航站楼

(赵用 陈铮铮 摄)

是温州的“鱼米之乡”。全区耕地面积8.4万亩，林地总面积7.55万亩，森林覆盖率20.9%，蔬菜种植面积3.3万亩，海涂养殖4万亩，淡水养殖2.12万亩。主要经济作物有蔬菜、花卉、水果等，其中以大岙溪杨梅、龙牌花椰菜尤为著名。主要养殖品种有文蛤、对虾、青蟹、沙蟹、鲢鱼等，其中灵昆的文蛤驰名中外。境内矿产资源丰富，有花岗岩、高岭土等矿种。

龙湾区域优势非常明显，交通发达。龙湾区是温州市区的东大门，机场大道、温州大道、瓯海大道横穿全区，市域铁路S1线、S2线（建设中）在此交汇。龙湾区又是浙南闽北的海陆空立体交通枢纽：区内有温州龙湾国际机场、温州港万吨级码头、金温铁路货运终点站等，甬台温高速公路和建设中的甬台温高速复线纵贯其中，海陆空立体交通十分便捷。2018年，龙湾国际机场年旅客吞吐量首次超1000万人次。

龙湾经济发达，作为温州改革开放的“窗口”，这里诞生了温州最早的股份制企业 and 全国首家民营外贸公司，是“温州模式”的重要发祥地，拥有温州唯一跻身世界500强的民营企业，拥有中国阀门城、中国制笔之都、中国鞋都女鞋基地等8张国字号金名片。2020年，龙湾区实现生产总值717.40亿元，同比增长2.6%；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5.88亿元，增长6.3%；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3938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281元，分别增长4.4%、7.0%。



龙湾高速交通枢纽

(洪金晶 摄)

2012年，温州国家级高新区正式挂牌成立，与龙湾区实行“政区合一”体制。2015年，市委、市政府作出了在龙湾区（高新区）区域内建设浙南科技城的重大决策部署。2018年2月，国务院发文批复，同意宁波、温州高新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这是继杭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后，浙江省第二个获批建设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龙湾区（高新区）进一步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2020年，温州高新区综合排名在169个国家高新区中位列第80位，成功迈进全国前50%。

龙湾人杰地灵，文化积淀深厚。龙湾区重视在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挖掘和弘扬“瓯越文化”，致力打造“古堡”“民俗”“名人”“书法”四大文化金名片。2013年，龙湾获“中国书法之乡”称号。拥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15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50项。拥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城堡永昌堡、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基地龙湾古炮台、距今四五千年历史的龙岗山遗址、建于唐朝的国安寺、建于宋朝的千佛塔、建于明代的玄真观，另外还保存着众多的摩崖题刻、古代墓葬、名人诗碑、



浙南科技城首个公共科创平台——“浙南·云谷”
(杨冰杰 摄)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永昌堡



龙湾国安寺

名人故居等，文物古迹点缀于青山碧水玉石之间，自然风光与人文英华浑然一体。龙湾文化名人辈出，历史上有南宋状元赵建大、明嘉靖内阁首辅张璁、一代词宗夏承焘等，有龙湾籍两院院士4位。

文旅九山，感知瓯江山水诗路

◇ 章方松

温州被誉为中国十大风水城市之一，源于晋代堪舆家郭璞为古城布局章法，以九山拟态北斗，二十八井象征星宿。何谓堪舆？堪，天道；舆，地道也，是仰俯天地间的学问。温州古城九山为北斗星座格局，统摄照应全城，以海坛山、郭公山、松台山、积谷山为斗门，华盖直其口；黄土山、巽山、仁王山为斗柄，以灵官山和仁王山边小山名湖屿。古城北与瓯江相应，呈现天文北斗七星绕北极转之宇宙大气场！此乃先贤智慧利益千秋后人也。

时序大雪，江南景和，与“珍

迹留缘”80位同仁一起，以步行的方式走读温州古城，行程为：灵官山—仁王—扈屿桥—巽吉山—黄土山—南门会市—万里桥—瑞安门—纱帽河女人街—登选坊—高公桥—五马后巷—五马街—公安路—谯楼—府前街—蝉街—永宁门—来福门—松台山—九山路九山河—迎恩门—郭公山—一定安门—江心屿码头—永清门—拱宸门—朔门老街—水门头—奉恩门—东瓯大厦—海坛山—镇海门—华盖山—积谷山。此行共二万六千步、十六点五公里，历时三个时辰（六小时）。追寻历史足迹、领略九山风光，以下为行旅随感记录，以示大家共识。

灵官山位于如今鹿城区吴桥路37号，现处一家电业工厂大院内，被四周高墙包围。高空航拍可见其宛如碧玉翡翠，葱郁耀亮。我们站在高墙外，凝神谛听，山鸟鸣声，清盈悠扬。灵官山位于巽吉山西南侧，于温州斗城总体布局而言，属小而明。灵



温州府志图

官山即在第六星左北斗九星中的第九颗，称辅星。灵官为道教护法天神，故有灵官辅“斗城”之说。

历史风尘转眼成烟，温州古城九山中的仁王山（今东屿电厂遗址）、黄土山以名狮子山，犹如威武狮子，注视着它与巽山之间的球形小山，人称“狮子捧球”。仁王山原有仁王寺，因仁王山毁灭，仁王寺迁移东屿电厂对面。而黄土山（今址锦春大厦一带）也已被历史风尘吹没，如今仅见车水马龙、满目飞尘。

巽吉山，又名巽山，山上有塔，又名雁塔。与之遥遥相对的松台山，则形如蟾蜍。蟾蜍头朝向巽山，似乎印证了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帛画



马王堆帛画局部

“日中有鸟；月中有蟾蜍”，呈现日月同辉的境状。

巽山上的雁塔可溯至宋代，明万历三年（1575）重建，后历四百年而圯，清道光五年（1825）修复。现塔为2004年重建。拾级而上，晨曦和柔，满山绿林，虽临冬天，然树林花草皆由天时、地利所感召，欣然绿艳。仰望雁塔，云飞云舒，此时结合境域，吟诵古人诗句，颇有妙感。如明代本土诗人何白《巽吉山怀白玉蟾和洪从周韵》：

一磴缘云凿翠通，山腰清閼化人宫。
松声泉响春容里，树色河流苍莽中。
明月於焉曾驻鹤，紫烟何处觅飞鸿。
怀仙三谏洪崖涨，八表冷然欲御风。

清郭鍾岳《瓯江竹枝词》云：

巽吉山头塔影尖，疏林斜挂月纤纤。
时闻清唳云中鹤，曾驻飞仙白玉蟾。

从诗人意境中感想往昔秀峰山景，塔影悠悠，云鹤翱翔，松泉树色，悠然眼前，更为巽山及人文意涵所感奋。

从巽山过万里桥。万里桥又名万利桥，于万里巷北端，南北向跨架蝉河。此桥始建于清朝中期，重建于1922年，是古城中桥位最高的一座古



昔日巽山塔

式石桥。桥两侧设青石栏杆，莲蓬望柱雕刻精致。夏日纳凉，月影临河，清风徐来，人语笑声，便成一道风景。

过了万利桥，就是瑞安门。相传郭璞登山相地，见数峰错立，状如北斗，于是北据瓯江、南濒会昌湖，东西依山兴建郡城，名曰斗城。斗城依山傍水，分段为镇海门、瑞安门、永宁门、来福门、迎恩门、永清门、望江门等七大城门。依据温州自然山水境域，构设山水城市格局的智慧，利益于子孙后代，功莫大焉。

古瑞安门，位于温州城南偏东。宋咸淳元年（1265），因温州称瑞安府故而得名。此地处古城之南，亦称大南门。过瑞安门，可见古风建

筑——南亭。谢灵运《游南亭》诗云：

时竟夕澄霁，云归日西驰。
密林含馥清，远峰隐半规。
久痾昏垫苦，旅馆眺郊歧。
泽兰渐被径，芙蓉始发迟。
未厌青春好，已睹朱明移。
戚戚感物叹，星星白发垂。
药饵情所止，衰疾忽在斯。
逝将候秋水，息景堰旧崖。
我志谁与亮？赏心惟良知。

谢灵运的诗，好在记录时间和地点。古时的南亭，应处原野上，空间视野宽阔，而读这首诗，感想诗意，颇有意思。诗人久病后为解脱苦闷，漫步郊垌，游览南亭。长满泽畔的兰草，覆盖路径；初发芙蓉，翠叶间长出鲜美花蕾。天空晴朗，云退日西，衔山落日，半隐山峰，余辉温和而绚烂。

而季候叠代，光阴如箭，人生百年，转瞬即逝。秋霜染青丝，泯去物我、是非，忘掉得失，皈依自然。诗人盼望归隐家乡故居，感受自然，澹淡自我，寻找物我感应的生命知音。诗人本想从自然山水间，消减悲愤苦恼，反而增添了幽愤的情绪。《游南亭》成了诗人对人生无常的感叹。清

人方东树曾说过：“自病起登池上楼，遂游南亭，继之以赤石帆海，又继之以登江中孤屿，皆一时渐厉之境，故此数诗，必合诵之，乃见其一时情事及语言之次第。”（《昭昧詹言》卷五）。唐代诗人杜甫仿佛是谢灵运知音，曾有诗云：“久为谢客寻幽愤，细学周题免兴孤。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吾友于。”（杜甫《岳麓山道林二寺行》）

过南亭，见“双桂联芳”一亭。北宋绍圣四年（1096），居住于此地王公辅、王公彦兄弟，同登进士第。温州知府杨蟠规划郡城三十六坊时，将此坊命名为“双桂芳”，以示“双桂并秀”。古时纱帽河称“双桂坊”。

过立交城开天桥，逛纱帽河街，一片繁华闹市，人流涌动。百姓安乐是国之太平气象，正如五代吴越王钱镠当年在温州修建子城，为的也是保境安民。

谯楼，俗称鼓楼，即古城子城遗存的南门，为钱镠之子钱传瓘（887—941）守温时所筑，位于城区广场路，属旧城中心。从谯楼古城沧桑，运思造境，想起谢灵运《晚出西射堂》诗云：

步出西城门，遥望城西岑。
连鄣叠巘嶂，青翠杳深沉。

晓霜枫叶丹，夕曛岚气阴。
节往戚不浅，感来念已深。
羁雌恋旧侣，迷鸟怀故林。
含情尚劳爱，如何离赏心。
抚镜华缁鬓，揽带缓促衿。
安排徒空言，幽独赖鸣琴。

也许是诗人操办好公务散步解闷，远望郊垌青翠，重叠崖壁，霜染红枫，恹恹降沉。诗人眼里，深秋的松台山，晚霞灿红。一只羁宿雌禽，失群无伴，似乎诉说旧侣怀恋；空中盘旋孤独归鸟，正找迷失归路旧巢，流露出诗人无比依恋远方亲人与无限悲愤的情怀。

诗人回到宿地，面对铜镜里青丝染上白霜，衣带随着身体消瘦而变得宽松。庄子语“安排而去化，乃人于寥天一”（《大宗师》），人生追求空虚寂寥境界，难道仅仅成为高谈阔论而已？只有抚奏琴声，自娱自鸣，排除幽独的孤寂苦闷心境！

子城遗址，千年瓯史耐思量。吴越王时，建府衙后人称“钱氏子城”，开新河（信河），温州古城形成东庙、西居、南市、北埠、中衙，符合“东方为木，西方为金，南方为火，北方为水，中央为土”五行理论。子城外面有护城河，河上有

桥连接城门。

古永宁门，位于温州城南偏西，瑞安门（大南门之西）。因永嘉郡建郡（323）前，此地属永宁县得名。永宁门较南门小，故称为小南门，为旧时水路交通要地，船只汇集，经贸繁荣。

松台山位于旧城西南角，宋代前称西山。唐代永嘉大师（665—713）圆寂后卜葬于此。山巅原有永嘉大师真身塔。唐僖宗赐塔名“净光”，故又称“净光山”。塔传梵音，木送山风，默念永嘉大师《证道歌》：

“一性圆通一切性，一法遍含一切法。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

月摄；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同共如来合。”

永嘉大师以月与水喻意“性”与“法”，为禅宗的智慧阳光照世，为世人所随喜赞叹！温州之水，引发永嘉大师之智慧闪耀。每念《证道歌》，便有日月昭明，以真为道，昏念妄起当灭也。由此，我想起陶弘景于永嘉楠溪江写有名篇《答谢中书书》：“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简约的文字，即表述楠溪江山水秀美，却蕴意着白云、高山、流水，仰观俯察，三重境域，高迈而清新。

松台山，因松而得名，历代诗人均有吟诵。如南宋翁卷“青松生青山，真节莫与并”；宋庆之“旧业双松在，初秋一锡归”；明周凯“一入山来尘梦醒，松风瑟瑟水泠泠”；清朱彝尊“苍苍山上松，飒飒松根雨。松子落空山，朝来不知处”句。且吟且行，有行旅同仁见山路边因泥土冬燥而爬满蚯蚓，遂用树叶轻盈相挟，让其回归树荫松软泥土。地厚载德，天道感应，人心向善。善哉！

至西城濠，西城濠处于古城西面，北达瓯江，南至小南门，格局完整。九山河水，碧波荡漾竹枝歌，为



松台旧照



九山雪景

鹿城一道水色亮丽风景。

温州古城初建，利用水利，沿城墙建护城河。郡城水系大致由环城的壕池与城内河、渠、沟、池组成。吴越钱氏增筑内城，旁通壕堑，形成内外城壕的独特水城格局。古人由环城自然水系，构设塘河、筑建三十六坊、七十二巷。妙哉！上善若水，水养大德，智汇源流，慧光照耀也。北宋温州知州杨蟠，有诗赞美其壮景：

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
水如棋局分街陌，山似屏帷绕画楼。
是处有花迎我笑，何时无月逐人游。
西湖宴赏争标日，多少珠帘不下钩。

古迎恩门。迎恩门位于温州城西北，旧名广化门，俗称西郭门。清末又称大西门。据说宋高宗赵构南渡温

州，从此门入城，百姓跪地迎候请恩而得名。

郭公山位于郡城西北，北临瓯水，南揽全城诸峰。为斗城天象天璇之位（又名武曲星）。郭公山，相传郭璞登此山相地定城，因此得名。以山名公，郡人感恩也！

郭公山上有富览亭，可望瓯水潮涛，孤屿水悠，双塔挺立，眼前浮现谢灵运诗境：“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远处则是罗浮云影，玄妙风神，令人情越而起诗境妙生。眼前景物与历史契合，正如唐刺史陈又新《郭公山》诗云：

昔贤登步立神州，气象千年始一浮。
南望群峰如列宿，北观江水似虬龙。

沿瓯水岸边，迎风迈步，风吹叶落，似听诗吟。过东门，“旧传华盖、积谷与海坛山相连，望气者以为太盛，凿断之，其门隘，俗称石窟门，今东门”（《弘治温州府志》）。童蒙是心灵记忆的倒影。同仁者于行旅间，指点旧时风物，似夜静倒影的碧潭月亮，清澈见底，如雪擦亮宇空的星星，晶莹灿亮。乡愁的物化审美，是心灵中的桥梁。于无奈的惆怅中，追忆童年记忆。

古城二十八宿井，海坛山四口。

过水门底，原白鹿庵内有白鹿庵井，现井仍处小巷尽头，有石刻题记。井者，地涌泉流，天心互应，生息自成。而古永清门，则是一片推土机后的新建工程，机器隆隆，尘土飞扬。

海坛山北临瓯江，东濒东海，南接华盖，为斗口之首，斗城天象之天枢。顾名思义，在此山祭奠大海之法坛。海坛南麓支阜慈山，慈山者，仁慈善行，遵天地万物之源泉蕴力耳。慈山拜谒叶适公墓，先生千秋笔法，与青山常在，伴静水长流。

站在海坛山，远望瓯江，心与物游，心以感象，蕴含着观赏者的情感意趣，山水本身隐喻着诗化的文字意象。清风吹拂，叶落于肩。阳光布辉于草木间，遥契于天道，印证着天息的感应。此时感识谢灵运的诗最妙，《郡东山望溟海》：

开春献初岁，白日出悠悠。
荡志将愉乐，瞰海庶忘忧。
策马步兰皋，继控息椒丘。
采蕙遵大薄，寥若履长洲。
白花皓阳林，紫萼晔春流。
非徒不弭忘，览物情弥道。
萱苏始无慰，寂寞路可求。

这是谢灵运到永嘉任郡守的第二年春天，他在海坛山上眺望瓯江，奔

腾东流，沧海茫茫，感觉自己仿佛屈原，被放逐而忧思。在春游观海中，眼前的兰草、素花、紫萼等反而令人消愁愁更愁，平添乱云般愁绪。唯有清静无为的隐居生活，才是诗人所追求的道家空廓无为境界！

过古镇海门。镇海门位于古城东隅，古称东门。旧传华盖与海坛山相连，望气者以为太盛，凿断之其门门隘。初名宜春门，后取“平静安宁”之意而改为镇海门。

朔风徐来，满径落叶，向上一路，便是华盖山。山径区区小菊花，散发馨香，上达苍穹，将其花草引向天地精神维度来解读，颇有一番审美情怀。登华盖山，见大观亭，想起清代诗人潘之彪有《大观亭》诗云：

鹿城高峙大观亭，揽袂倏然入画屏。
孤屿近看僧合掌，列山遥望佛头青。

此时，弥念旧游，心念览景玄思。读诗入境，由境悟诗，引诗情思，诗是游华盖山的引导者。唐张又新诗《华盖山》：

一岫坡陀凝绿草，千重虚翠透红霞。
愁来始上消归思，见尽江城数百家。

宋温州知州杨蟠《登华盖山》诗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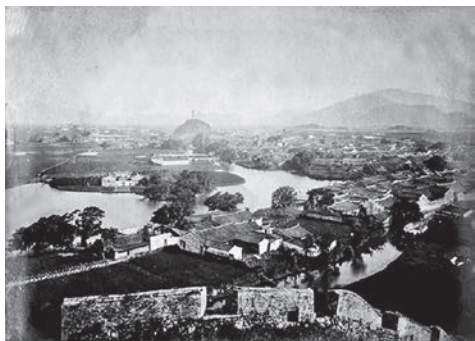
七山如北斗，城锁几重重。
斗口在何处？正当华盖峰。

华盖山有古城墙遗址，从古城墙的石头与砖块中，感识温州历史的沧桑。眼前的每一块石头或砖片，都成为触摸的经典。经典必经沧桑，但并非所有沧桑都是经典；华盖山麓有红日亭，夏天免费供应伏茶，冬天施粥，成为温州一处道德风景。

看到积谷山上一草一木，回想曾经行旅此地的往事，总是那么亲切可爱。人类扎根于自然风土与历史人文的充满生机的土地，滋养与润泽中，茁壮成长，往往处于不知不觉而已。人类赞美自然秩序，就是对自身生命的尊重。站在留云亭，可望城市风景。南宋林景熙《鹿城晚眺》诗云其景观，读其诗，对积谷山于古城的地理位置，亦有所理解：

古城仙鹿远，百感赴斜曛。
海气千年聚，山形九斗分。
神鸦饥啄藓，宰木蠹藏云。
何处鸣钲发，春屯又易军。

积谷山于北斗九山之口，山中旧时有飞霞洞、谢池、池上楼、东山书院、小赤壁、谢客岩、升仙台、留云亭等胜迹。积谷山飞霞洞口，曾有



华盖山古城墙



积谷山



谢客岩

“谢客岩”三字摩崖石刻。《乾隆温州府志》卷二三有载：谢客岩，旧志：在积谷山飞霞洞口。谢灵运尝书“白云”“春草吟”于崖上。（今）多湮没，惟“谢客岩”三字尚存。

古人佚名于《积谷山赋》有云：“朝晞则千山吐爽，暮霭则万树凝烟”“草长池边，追思谢客；霞飞洞口，遥忆刘仙。吐东山之明月，澄一镜之清泉；圜参差之城堞，错满眼之市廛”。眼下，虽然冬天，但积谷山的树木翠绿，清风吹摇着树梢，仿佛吟诵着谢灵运的诗篇。而谢客岩也成为历代诗追忆谢灵运的朝圣行旅之地。南宋林景熙《登谢客岩》诗云：

戡嶂镇九斗，鼃屐挟五丁。
飞霞适何来，缥缈开殊庭。
永怀谢康乐，坐啸山水城。
旷代得真契，登临有余情。

读其诗，使人更深刻理解积谷山的古城人文地理位置，以及诗人对谢灵运无比恭敬的缅怀之情。于积谷山飞霞洞相望池上楼，清代学人梁章钜曾有联云此处风景：

面壁拓幽居，一角永嘉好山水；
筑楼存古意，千秋康乐旧池塘。

行旅山水，感知山水诗意，吟诵山水诗、体悟诗人情怀。这是当下文旅重要题旨之一。从行旅中感识物化审美体悟山水诗意画境，便有深刻记忆与感悟自然与人文审美情怀。今天我们阅读与感思一座城的人文经典，不是因经典复兴而循旧日人文而行之，而是以感化经典后萌芽新经典的理念。以此祝我们这座城市从旧经典，飞向更加广阔的新经典高度！

（作者单位：温州文史馆）

（上接第82页）

定时间、地点，请我方领导人前去当面洽谈。12月10日，吴毓率瓯北县委组织部长徐顺性、武工队副队长潘统镛等，冒险来到匪巢，不幸遭暗算，除2位地方工作人员脱险外，吴毓与其他5位同志均被杀害。吴毓牺牲时年仅32岁。

吴毓虽然看不到胜利的红旗飘扬，但他和其他先烈以鲜血谱写的悲壮乐章，永远在括苍的群山峡谷回荡！

（文章来源：《浙南百名英烈传》）



王振鹏《江山揽胜图》局部线描，描绘了宋元温州商港的繁荣景象

(项之华临摹)

